

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论坛

通 讯

第 1 期 中国社会学会农村社会学委员会

2012 年 1 月 15 日

目 录

- 一、江一真二、三事.....石 山 (1)
- 二、怀念侯学煜.....石 山 (4)
- 三、深切怀念张培刚教授.....郭书田 (6)
- 四、我国土地制度与土地政策的走向.....黄小虎 (13)
- 五、在城镇化过程中要处理好农民的土地问题.....卢 文 (22)
- 六、建设发展小城镇是提高城镇化率的有效举措.....林 干 (27)
- 七、努力提高城镇化的水平与质量.....朱丕荣 (31)
- 八、世界粮食丰收后的政策动向.....吴天锡 (34)
- 九、关于聚集理论在工农业发展上的应用.....孙万鹏 (40)
- 十、农业连续八年大丰收.....吴信达 (46)

“江一真二、三事

石 山

江一真，一生坎坷，坦荡磊落；一生奋斗，才华超群。干什么都干到成绩卓著。当医生，红军时期就是有名的“江一刀”。“文革”后，受命派驻“重灾区”卫生部，成为共和国第四任卫生部部长；搞地方工作，解放战争时期到苏北，“文革”前已是福建省委书记、省长，从基层做到“封疆大吏”；搞农业，从省农委主任、省农村工作部部长、农学院院长，做到共和国农业部部长。离休后，到中顾委，又为全国老区特别是闽南山区百姓脱贫致富，为国家许多历史和现实问题的解决竭尽全力。他尤爱垂钓，不仅促成了“中国钓鱼协会”的创立，还出版了《中国钓鱼》杂志，编写了《钓鱼指南》大型丛书。一生所为，立德立行，皆为楷模。详细情况已有一部传记问世。

这里只说说与我相关的三个小故事。以寄托对他的怀念之情。

一、抓四人帮之夜

当时，江一真还未分配工作，和我同住在一栋楼里，他住二单元，我住三单元，因而时常见面交谈。

那一夜，江一真兴奋的像个孩子，两次跑到我家，我们几乎一夜没睡。

那天夜里，我还没上床，听到敲门声，江一真一脸兴奋地进来，没等我开口，他压低声音，语调里充满难以抑制的激动：中央动手了，抓起来抓起来，抓了三个，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部队动的手。这突如其来的扭转乾坤，一刹那的震撼，就像一下掀翻了压在心头的大山，大快人心，我们睡意全无。他向我讲述他得到的抓捕时的更详细情况，他说，我先回去，还会有消息。我开着台灯，坐在沙发上等，不一会儿，轻轻的几声叩门，江一真进来，暗暗的台灯阴影下，他眼睛里闪着光，几乎是手舞足蹈。江青也被抓住了，还抓了毛远新，一个坏蛋也没漏网。全国上下翘首以望中央解决他们的问题，没想到好消息来得这么突然，我们细细地聊着。他叮嘱我，明天一早就去把这个喜讯报告给老板（谭震林），那时，为防止四人帮余党逃逸，抓捕消息保密，他担心老板还不知道。老板听我讲述后，笑着说：“这是国家的一桩大好事，江一真与部队联系多，消息灵通，他讲的消息是可靠的。”他似乎已从另外渠道知道了这个消息，我当然不便打听。

二、介绍我到中国科学院

1977年底，江一真和李昌在一起学习，李昌对江一真说“我要搞农业现代化实验县，你给找几个人”。江一真回来问我的态度，我当然愿意，他也支持我

去。他俩再见面时，江一真推荐我，李昌一听就说：“好好，我们认识，请他来，请他来，再多带几个人来。”这样，我于1978年初调到中科院。

这件事，对江一真不过是“举手之劳”，对我却是事业也是人生的转折点，我一直非常感谢他。没有江一真的推荐，李昌想不起找我，而我也不知道他要搞农业现代化实验县工作，也不会找他。那时我在农林部，因为部领导说我和江一真、季宗权一起反对“中央文革”，而被另眼看待，我的一些建议也因为不符合“主流思想”而被束之高阁。人被闲置着，无事可做，只能看看书，处在一种“难有作为”的境地，浪费了大好时光。

农业现代化实验县工作，最初由已有的支农办公室负责，我去后接任主任。1979年改为农业现代化研究委员会，我任主任，同时被任命为中科院副秘书长。李昌确定的5个实验县¹，中南、华北、东北、西北、平原、山区、干旱、半干旱、农区、半农半牧区、先进县、一般县、贫困县都包括了。我们又采纳了钱老（钱学森）按系统工程方法搞规划的建议，连办数期系统工程学习班。之后，这5个县便按照刚刚学到手的系统工程的方法研究和制定各县的发展规划，成为我国第一批采用系统工程方法编制经济发展规划的县。我们趁热打铁，出版了一套《农业系统工程》丛书，系统工程的理论和方法逐渐在农业系统推广。后来的生态农业县建设活动中，各县也采用这个方法搞发展规划。这类县最多时达200多个。

我有5年时间，全力从事这项实验工作，不仅收益良多，而且是最全面的学习和锻炼，终身受用。

三、再合作一次，为革命老区做点有价值的事

在他晚年，在北京成立了闽西老区建设促进会，积极主动地为老区建设献计献策。有一次，他对我讲：“咱们再合作一次，为我的老家福建龙岩地区建设事业做点扎实的基础工作。”

我问：“龙岩地区真想干吗？”

“那当然，这个由我负责解决。”

我说，龙岩老区是山区，开发和建设山区必须用系统工程的方法制定一个科学发展规划，老老实实按规划认真实行，舍此，没有什么其他办法能搞好山区。

他知道我不好直接请龙岩的同志这么干那么干，就说：“福建和龙岩领导方面我负责”。由我请专业人员到龙岩，讲课、培训当地干部、科技人员，和他们

¹湖南桃源（学大寨先进县），成立长沙农业现代化研究所负责实验工作；河北栾城（大寨县），成立石家庄农业现代化研究所负责实验工作；黑龙江海伦（一般县），成立黑龙江农业现代化研究所负责实验工作；宁夏自治区固原（贫困县）、盐池（贫困县），收回已下放的西北水土保持研究所，负责两县的实验工作。这就是所说的五县四所。

一起用系统工程的方法制定出龙岩山区建设规划。

我和几个人在闽西山区作调研，做了多次报告，所到之处，深感闽西山区建设大有希望。江一真到了以后，我先向他谈了考察所得和如何建设的意见，江一真对我说：“我看开一个千人大会吧，你在台上讲，我和魏老（魏金水）、伍老（伍洪祥）在台下听，作你的听众”。他说干就干，真的就召开了千人大会，他们三老硬是坐在下面听，我作了“希望在山区”的报告。之后，就请几位系统工程教授，在龙岩讲了一个多月的课，参加培训的干部有 350 多人次。他们帮助制定出龙岩山区建设规划，龙岩地区踏踏实实按规划干起来。龙岩地委把规划印成一本书公开发行，江一真题词，我写了序。我把这件事告诉了裴老（裴丽生），裴老当时已经到老促会工作，他对此事十分赞赏，决定在龙岩召开现场会，让全国所有老区都派人参加，学习推广龙岩经验。虽然裴老因年迈体弱未能到会，但现场会开的非常成功，对老区建设也是一次推动。

在龙岩地区的这次合作，成了我们的最后一次合作，回京后不久，他的肺癌发作，一病不起。他在家养病时，我去探望，他念念不忘山区，说：“如果能活几年，我们还能一起干好多事。”惜哉。可以告慰江一真的是，龙岩那个规划是科学的，他们认真实行了，龙岩山区的绝大多数农民不仅早已脱贫，而且过上了小康生活。

（本文由石山口述，石小玉执笔）
（作者：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顾问）

子曰：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

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
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

——《中庸》

怀念侯学煜

——一位一生尊重自然规律、深入实际、坚持 和而不同作风的著名科学工作者和著名学者 石山

侯学煜是中国科学院植物所老所长，参加了中国科学院农业现代化实验县工作，对实验县工作提出过不少意见和建议。我们第一次向中央有关部门汇报实验县工作进展情况时，他是两位主讲人之一。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向来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不迎合，更不奉承。我离开科学院后，我们之间交往不断，关系也愈来愈密切，彼此信任，无所不谈。

一

他知道我“文革”前一直在中央办公厅地区组工作，常年跑调研，与各地联系多，一次，他要去青海考察，问我在青海有认识的领导吗？当时，梁步庭正好在青海当省委书记，以前我们在农口共事多年，彼此了解，我给梁步庭写了封信。侯学煜到了青海，对省里接待的同志讲，梁书记的一位老朋友托我带给他一封信。梁到他的住处接待他，侯学煜讲了他的考察计划，梁步庭与他商量活动日程，侯学煜考察后又向梁提出了详细建议。他没有什么要求，只是希望他的意见能得到重视和起点作用。有了这次经验，他每次到外地考察都要问我，XX省XX地区有没有熟人当领导，凡有熟悉的我都帮他写封信，地方同志都帮他做了很好的安排，彼此都受益。

二

说起他的考察、调研，那完全是“侯学煜风格”的，他从来不让地方干部陪同，只要一位科技人员跟着，指指路、介绍些当地情况。他也从来不问中央是什么政策。他通过深入实际，了解情况，独立判断后得出自己的结论。如果中央的政策和他的结论一致，对自己的结论也就点头认可。如果和中央决策不一致，他会再作调查研究，看看是谁错了，错在什么地方，如何改正。他对我说，如果我的看法错了，我改，如果调查思考的结果还是我的看法正确，那我会提出我的意见。这番话，让我深深思考，能如此看待中央文件、如此看待自己的思想见解，又能如此酣畅淋漓讲出的，能有几人！这样的人正是我们最需要的，这样的人多了，就能改变社会风气，整个社会就能畅所欲言，意气风发，社会就能大步前进，建设事业就能快步发展，国家就能立于不败之地

三

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1983年春，在人代会会议上，侯学煜对于号召全国青少年采集树籽、草籽支援西北开发的作法提出了批评，因为这种做法违反了适地适树原则，这样采集运送树籽、草籽，完全不适合西北的自然条件。西北不能用，白白浪费了沿

海青少年的劳力和时间。他把自己的意见写成提案，没想到提案组不敢接，说这是总书记的号召，怎么能提案反对。侯学煜当时就火了，大笔一挥，在提案上签了名：“这个提案我负全责，你要是不提交上去，你负责！”

提案交上去了，代表们很赞成，认为意见提的好，十分及时，纠正了一件常识性的错误。随即停止了全国青少年向西北送树种的活动。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据说林业部的一位领导认为侯学煜这个提案是反对总书记，竟然要批判他。林业部的专家们说，这个意见应该由我们林业部门提出，适地适树，谁都知道，我们自己不提已经很丢人了，怎么还有脸批判人家。

四

侯学煜对修建三峡大坝一直持否定态度，他是生态影响评估专家组的，他愤愤地对我说：“我决不签字，他们就不找我论证了，只找那些同意的去论证。”愤怒和无奈溢于言表。我记得马世骏也是生态影响评估专家组的，他采取了和缓一些的对策，他们这个组一致同意“弊大于利”，没想到，这样也不行，有人找他说：你看别的组都说利大于弊，就你们这个组说弊大于利，能不能也改成利大于弊，马世骏被激怒了，他一字不改，拂袖而去。

五

和侯学煜熟识了，知道他“倔”。有一次他到西北出差，回来和我讲：在旅馆已经住了一天，服务员过来请他换个房间，说有什么什么人要住，他那犟脾气一下上来了：“行，让我倒房子可以，我立即回北京，你去告诉省里，这里的事不办了！”人家毫无办法，据说那位什么什么人还算随和：“好吧，我住其他房间吧”。直到侯学煜办完事回到北京，也不知道被他“倔”了一顿的是谁。

晚年，侯学煜对我说，这辈子，自己的“不识时务”、自己的“倔脾气”得罪了不少人，但“能结识你，还谈得来，也就满足了”。我说：你太看重我了，在学术上，我是一名布衣，门外汉，不能与科学家、学者并列，与你们相交，只是想学点东西，沾点光。

侯学煜一辈子讲真话，办实事，独立研究，独立判断，坚持己见，从不苟同，一辈子坦荡磊落，和而不同，实在难能可贵，作为一名学者，他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

离开科学院后，曾几次见到植物所的新领导，谈起侯老，他们都十分敬重他，都认为他了不起，是青年人的楷模。只要社会尊重这种人，就会有更多的人这样做。我们的社会，这样的人是不少的，只要为他们创造条件，他们就会大批涌现。我们需要这样的学者、这样的科学家，这样的人多了，国家才能兴旺发达，人民才能幸福。

（本文由石山口述，石小玉执笔）

（作者：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顾问）

深切怀念张培刚教授

郭书田

2011年11月27日，著名经济学家、发展经济学奠基人张培刚教授不幸去世，享年98岁。在看到这个消息时，立即联想到在拜读他在哈佛大学的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成为发展经济学奠基之作的深刻感受，也联想到在与他几次接触后难以忘怀的深刻印象。我在给大学生讲中国国情课时，常介绍四位从理论到实践一生关注和研究农民问题的前辈：梁漱溟、晏阳初、费孝通、张培刚，要向他们学习。2007年8月3日，我曾写过一篇拙作：《再论张培刚教授工业化理论》，记述了在张教授的理论影响下组织“农村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简称“三化”）课题组及活动情况，其中提到1991年5月3日至5日在武汉东湖召开的座谈会，张教授出席讲话，难以忘怀。为了悼念张教授，现将这篇拙作连同《中国青年报》2011年11月30日刊载林衍的《张培刚：一生传奇半生遗憾》和《光明日报》12月8日刊载张春雷、夏静的《张培刚：博士论文奠定发展经济学基石》一并刊载如下：

再读张培刚教授工业化理论

2007年8月3日

2007年6月19日，万典武教授给我寄来张培刚教授的《农业与工业化（上卷）：农业国工业化的问题初探》十分珍贵。在本书之后出版了《农业与工业化（中下合卷）：农业国工业化问题再论》。这是我第二次拜读这本名著。早在1991年5月3日，我们在武汉东湖召开农村工业化、城市化与农业现代化座谈会，刘纯彬同志约请张培刚教授出席，并发表高见。张教授欣然应允，在会上发了言。这是初次与张教授见面。他亲笔签名赠送了这本书，第一次拜读了这本名著。

万典武教授与董辅初、李景文等著名经济学家，都是张培刚教授的学生。万典武在赠给我的这本书扉页上写了一段话：本书是著名经济学家张培刚教授1945年在哈佛大学的博士论文，获该校经济学专业最佳论文奖和“威尔士奖金”。1947年作为《哈佛经济丛书》第85卷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1969年在美国再版。1951年译成西班牙文在墨西哥出版。本书中译本在35年之后，于1984年首次由华中工学院出版社出版。2002年由香港花千树出版公司重印英文本发行。同年由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重印中文本。在重印本中加了一篇张教授撰写的《“发展经济学研究”丛书总序》和《“农业与工业化”的来龙去脉》口述稿。10月，在张教授90寿辰的庆贺会上，对重印的中、英文本举行了隆重的首发仪式。

据万典武教授称，1946—1947年，他在武汉大学经济系读研究生第二年，与同班同学曾启贤共同将此书译成中文。世人认为本书是“发展经济学”奠基之作，张教授是“发展经济学”的奠基人。世界银行专家Hollis Chenery教授1982年在上海讲学时说：“发展经

济学的创始人，是你们中国人——培刚·张”。

在我与万典武教授交谈中，深感在经济学界，特别是在青年中，知道张培刚教授的并不多。我在一次给大连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师生讲课时，曾作过一次小测验，在听课的近千人中，知道张教授的只有两个人。我建议万教授多写些文章介绍张教授的经济学理论及贡献。

张培刚教授把“发展经济学”分为广义和与狭义两种。凡研究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经济发展问题的理论都可以算是发展经济学。亚当·斯密的《国富论》(1776)，熊彼特的《经济发展论》(1912)以及罗斯托的《经济成长的阶段》(1960)等，都是广义的发展经济学。而研究农业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或者说如何实现经济起飞和经济发展的问题，可以称之为狭义的发展经济学。张教授的发展经济学属于后者。

张教授认为，农业国家或经济落后国家要想做到经济起飞或经济发展，就必须全面(包括城市和农村)实行“工业化”，这与当时有些人主张“以农立国”论或“乡村建设”学派是大不相同的。

张教授认为，根据“垄断竞争理论”中农业与工业的相互依存关系以及农业对工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贡献”和“基础作用”，从粮食、工业原料、劳动力、市场、资金(包括外汇)等五个方面阐明了农业对工业以及整个国民经济的“重要作用”与“巨大贡献”。以后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教授于1961年发表了《经济增长与农业的贡献》一书，提出农业的贡献，包括产品(粮食与原料)、市场、要素(剩余资本与剩余劳动力)、出口产品获得的收入等。印度经济学家苏布拉塔·加塔克(Subrata Chatak)和肯·英格森特(Ken lngersent)合写的《农业与经济发展》一书，把出口收入作为“外汇贡献”便成为西方经济学中常引用的农业“四大贡献”。把“产品贡献”分为“粮食”与“原料”，便成为五大贡献。库氏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许多学者认为，张培刚教授应当是此奖的获得者，而由于他谢绝了哈佛大学和联合国的聘请而回国，未能获得此奖。中国工业化道路与西方国家不同，是社会主义工业化，也就是苏联模式的工业化。它是以重工业为主、国营为主、国家投资为主、城市为主的工业化，农业为工业化的“贡献”，除了提供粮食、工业原料、出口创汇外，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形式提供了原始积累，而又把农业剩余劳动力滞留在农业，甚至还把城市职工下放到农村，造成严重的后遗症。

张培刚教授指出，工业化的定义不仅包括农业的现代化和农村的现代化，而且还强调了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的重要性和它们的“先行官”作用。从张教授这一观点看，毛泽东在上个世纪60年代曾经指出“交通”与“通讯”是两个“先行官”的主张，应该说是符合发展经济学理论的。

张培刚教授指出，一个农业国家或欠发达国家，只有农业生产总值占全国的比重，由原来的2/3甚至3/4以上，降低到1/3甚至1/4以下，同时农业劳动者总人数占全国的比重，也由原来的2/3甚至3/4以上，降低到1/3甚至1/4以下，这个国家才算实现了工业

化，成为“工业化了的国家”，而且这两个标准缺一不可。我国工业化已经达到很高的程度，农业占GDP的比重已经下降到2006年的11.7%，尽管在改革开放以来，异军突起的乡镇企业和进城的农民工，转移了2.1亿农业劳动力，而目前农业劳动力2.4亿，仍占劳动力总数的40%左右，未能同步降低，是畸形的，这是农业经营规模小、机械化程度低、商品率低、农业劳动生产率低、务农农民收入难以提高、工业化成果农民难以分享、城乡差别难以缩小的关键所在，与张教授的理论是背离的。

张教授的发展经济学理论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近些年来，在中国经济学界人们关注多的是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路易斯和舒尔茨，对张教授的理论研究不够，不能不说是经济学界的缺憾！

我在农业部任政策法规司司长期间，关注农村工业化与城镇化问题。1986年9月9日至15日，由农牧渔业部、中国农经学会、人民日报社、经济日报社联合举办了全国中青年农村经济研究会，并在苏州举行了第一次研讨会。农业部顾问边疆参加。会上河北省委农村政策研究室刘纯彬向我提出农村工业化与城市化问题的研究，我立即表示赞成与支持。会后成立了农村工业化、城镇化及农业现代化课题组，开展研究工作，简称“三化课题组”。并将刘纯彬调至农业部政策法规司从事这项研究工作。农业现代化是我加的，因为不要在大的二元结构尚未解决之前，由于农村工业化与城镇化而出现小的二元结构，即发达的工业和城镇，而萎缩的农业与农村。城市化改为城镇化，是由于农村工业，特别是乡镇工业，多分布在小城镇，而不是远离农村的城市。

1988年6月14日至18日，农业部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三化课题组”在河北省涿州市召开了“三化”研讨会。原中纪委书记李昌、原海南区党委书记杨泽江、农业部顾问边疆出席。由刘纯彬执笔提出初步研究报告。

1988年9月12日至16日，在河北省泊头市调查户籍制度改革问题，政法司张文宝参加。市委书记李瑞昌毕业于北京工业学院的导弹专业，对从外地到该市的农民工向当地政府交纳城市建设费，就可以转为城市户口，“三化课题组”在这里召开会议，有关部门、大专院校、科研单位、新闻媒体一致肯定这个做法，只有省公安厅内的一位代表说这是“卖户口”，与现行户口制度有矛盾，予以否定。以致李瑞昌受到压力。而省长岳奇峰则支持这个做法。

1989年4月1日至3日，“三化课题组”在广空东莞市召开座谈会，广东省农研中心主任马恩成出席。讨论了由我和刘纯彬编著的《失衡的中国》初稿。首次提出消除城乡分割的14项制度的建议。该书于1990年11月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1991年6月再版。政法司李光英参加这次座谈会。座谈会后，去东莞市的虎门、石龙、常平三个镇，深圳市的布吉镇，珠海市的西区白藤湖作了实地考察。

1989年12月6日至8日，我率代表团前往美国夏威夷大学——东西方研究中心参加中美合作的四省（江苏、浙江、广东、河北）农村劳动力转移讨论会。马恩成、刘纯彬、张

光参加。这是“三化课题组”研究的部分内容。由高等院校的学生问卷调查得来的数据，会后东西方中心还派澳大利亚专家来北京参加数据核对与整理工作。

1990年9月17日，在山东青岛主持召开“三化课题组”会议，交流了“三化”经验，农科院农经所所长牛若峰、中国人民大学农经系主任周志强等出席。经农业部批准，将该市所属即墨县、胶州县作为“三化”试点县，会后对两县作了实际调查。政法司陈秋荷参加这次会议。

1991年5月3日至5日，在武汉东西湖召开“三化课题组”座谈会，张培刚教授出席并讲话。政法司李彦立参加。这是第一次与张教授见面，留下难忘的深刻印象。

1994年5月31日至6月3日，“三化课题组”和广东省农委在广州市花县召开经验交流会。原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张根生、原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厚泽、郑重出席并讲话。我作了“中国农民与农村现代化”的发言。会后参观了花县的小城镇建设。至此，“三化课题组”研究暂告一段落。

1996年10月26日，在出席华中农业大学召开的全国高等农业院校农村社会学教学研讨会后，去华中理工大学会见了名誉校长张培刚教授，在座的有湖北社科院院长陈立科和副院长廖丹清以及张老的博士研究生。张老讲到从美国回国后曾在浙江、广东调查过粮食市场价格，有大量的第一手资料，拟整理出来，加上解放后的粮价资料，出一本集子，提出由我协助提供一些资料。事后，我将有关资料寄送给廖丹清副院长，后在《发展经济学研究丛书》中有一本《20世纪中国粮食经济》出版。“三化课题组”历经10年。国内形势发生了极大变化。总的来说是从“三化”的方向不断发展的，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特别是农民工进城务工经商，对突破城乡二元结构，起了重大作用。尤其战胜了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特大洪涝灾害以及2003年“非典”的冲击，农村经济保持了高速增长的势头，农民生活继续改善，农产品出口增加。1998年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农村工作若干问题的决定》，从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任务。党的十六大，进一步明确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首次提出“建立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新体制”，强调“三农”工作是全党和政府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采取了包括取消农业两税与“三提五统”费，增加对“三农”的投入等许多具体措施，受到农民的欢迎，在走向城乡一体化过程中，迈出了可喜的一步。中央提出中国经济已经进入“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新阶段，为从根本上改变二元结构的制度安排与政策，有了明确的目标。张培刚教授的理论正在中国逐步实现之中。

张培刚教授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他于1913年7月10日出生于湖北红安县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从小随家人从事放牛、砍柴、栽秧、割稻等劳动。1929年春，他15岁半，插班考入武汉大学文预科一年级下学年，毕业后于1930年秋进入武汉大学本科经济系，于1934年6月毕业。旋即按预约选送进入前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从事农业经济调查研究工作，

到河北、浙江、广西、湖北的乡村做社会调查，写成《清苑的农家经济》、《广西粮食问题》、《浙江省食粮之运销》等著作出版，并在刊物上发表了许多有见地的文章。1941年9月考取清华庚款留美公费生，至哈佛大学研究生院工商管理学院学习。选读了张伯伦（Edward H·Chanberlin）教授的“垄断竞争理论”和约翰·D·布莱克（John D·Black）的“农业经济政策”等课程。1943年11月至12月，先后通过硕士学位考试与论文答辩。接着选择了“农业国实现工业化”作为博士论文选题。1945年12月通过了哲学博士学位，于1946年先后在纽约与南京工作数月。同年8月，他从美国回到武汉大学任教兼经济系主任。1947年4月，这篇博士论文获1946—1947年度哈佛大学经济学专业最佳论文奖和威尔士奖金，并列为《哈佛经济丛书》第85卷出版。1948年1月受聘赴联合国工作。1949年2月辞去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顾问和研究院职务以及哈佛大学两位导师布莱克和厄谢尔回哈佛任教的邀请，再次回到武汉大学。但在“左”的路线下，未能从事经济学教学研究。有10年时间从事基建总务工作。1996年我去学校会见他时，他指着校园内大树说：这些树都是我一株一株亲自挑选、栽种和管理出来的，表示出他对这些大树的珍惜。有10年从事政治课教学工作，实际是参加上山下乡从事体力劳动。有10年“文化大革命”，受批判和审查，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改革开放以后，他为介绍和引进西方发达国家有关市场经济学原理，尽绵薄之力。1998年被批准设博士点，招收博士生，任华中科技大学名誉校长。

1940年张培刚在昆明考入清华大学留美公费生，清华大学经济系教授、著名经济学家陈岱孙是他的导师。陈老在张老80寿辰时撰文说，他的论文受到重视的原因是，它是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为——新兴经济学的“发展经济学”开先河的著作。他的学生董辅初在重印这本论文时说“在20世纪中叶的天空中划过那一道炫目的亮光”。在哈佛大学出版这本论文时，有的媒体报道说：“哈佛论经济，东方第一人”。我们衷心祝愿张老健康长寿！

张培刚：一生传奇 半生遗憾

11月27日这一天，中国最著名的经济学家们共同送别一个名叫张培刚的98岁老人。

张五常为他写了悼词，悼词里管他叫“大哥”；周其仁穿着黑色的西服发言，说自己在她面前只是“蹭课的旁听生”；吴敬连与厉以宁嘱托弟子坐第一班的飞机赶到武汉，为他献上花圈。

获“大卫·威尔士奖”

如果不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副所长巴曙松在微博上发布他去世的消息，大部分人可能并不清楚在聚光灯之外还有这样一个经济学家。的确，除了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的名誉院长，他再也没有任何更显赫的头衔；他一生只写过10多本书，远谈不上著作等身；直到85岁，他所在的学院才第一次申请到博士点。

1913年，张培刚出生在湖北省红安县一个普通农民家庭里。

从武汉大学毕业后，他带着探寻落后农业国如何走向工业化和民主富强的愿望，以庚款

留美考试全国第一名的身份进入哈佛大学，并于 1945 年 10 月写就英文稿的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这篇论文由哈佛大学出版社七版，并被总编辑迈克尔·费希尔盛赞为丛书中最具影响力的巨著之一。

不久，他成为哈佛大学经济学科最高荣誉奖“大卫·威尔士奖”获奖者中第一个亚洲人，与他同时获奖的人是后来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萨缪尔森。

1946 年，博士毕业的张培刚婉拒了在哈佛大学留校任教的邀请，回国到武汉大学做了经济系主任，被誉为“一代大师”的已故经济学家董辅初便是他的学生之一。1956 年，两位智利学者到北京要求见 Pei kang Chang (张培刚)。原来，他的博士论文出了西班牙语版本，在南美引起巨大轰动。那时，张培刚称得上是中国经济学领域最璀璨的一颗星。

“好难出一个张培刚，我也做不到。”以“狂张”闻名的张五常曾这样评价这位“大哥”。

逃不过的厄运

然而，从头号资本主义国家学成归来的张培刚也逃不过那一场又一场的“运动”。

1957 年，他被下放到湖北省红安县劳动。村里的老人至今仍记得，这位戴着眼镜有点知识的农民白天推着四百斤左右的粪车，晚上则在水塘边的大枫树下教农民识字。

后来，张培刚在华中科技大学做基建办主任，是 7000 多工人的“工头”，主要任务是劝农民搬家迁坟、为工人申请水泥沙石。

1966 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张培刚成了反动学术权威，因博士论文中曾提及“战争可以促进经济发展”，他又被冠以战争贩子等罪名。

他的夫人谭慧记得，“文革”时，张培刚白天要拿榔头修马路，到家后往往还坐不了多久，门便被敲开，“张培刚，出来去劳动！”

“文革”结束后，年过六旬的张培刚终于重返讲台。

上海财经大学教授林珏做过张培刚 5 年的研究助理，他告诉记者，老先生对苦难可以一笑置之，但对离开讲台与书本 30 多年这件事却始终难以释怀。“这些年我就像一棵大树

一样不能挪动，等到终于要拔起来的时候，老都老了。”张培刚这样说。

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这样评价张培刚，他有责任感，真正关心我们这个时代、关心我们这个国家。

在人生的最后几年，在研讨会上，与会者都会提到人均 GDP 标准问题。张培刚发言说：“倘若经过 10 年发展建设，武汉市民每家冬天能用上暖气，夏天能用上空调，到那个时候如果我不在了，你们要去我的坟头上告诉我一声。”（《中国青年报》11.30 林衍）

张培刚 博士论文奠定发展经济学基石

11 月 23 日，发展经济学奠基人张培刚因病医治无效，在武汉去世，享年 98 岁。

1941 年，张培刚考取清华大学庚子赔款留美公费生，进入哈佛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学习。进入哈佛后，张培刚并没能完全安下心读书。他想，工商管理让自己致富易，让国家脱离

贫穷落后难。为了寻找强国富民途径，他几个月后从哈佛工商管理学院转入文理学院经济系学习。

当时哈佛经济学科处于全盛时期，大师云集，张培刚师从他们，深入学习和研究当时世界最前沿的经济学理论。

在哈佛的几年时光里，这位中国年轻人一直思考一个问题：灾难深重的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将如何实现工业化，从而繁荣富强？

获得硕士学位并取得博士候选人资格后，张培刚将“农业与工业化”作为自己的博士论文题目。他打算探讨和分析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将要遇到的种种问题。

1945年底，他用英文写成《农业与工业化》，成为第一个获得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的中国人。

交完哈佛博士论文，尽管张伯伦努力劝其在哈佛任教，一心想把理论付诸实践的张培刚还是决定回国，应武汉大学邀请担任经济系主任。第二年，张培刚突然接到哈佛大学的来信，称其博士论文获得了哈佛大学1946~1947年度经济学科最佳论文奖和被称为小诺贝尔奖的“大卫·威尔士奖”。

《农业与工业化》对农业国家如何进行工业化提出了许多重要论断，最早建立了适合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模式。张培刚在该书中提出：农业国家要想实现经济起飞和经济发展，就必须全面实行工业化，不仅包括工业的机械化和现代化，而且也包括农业的现代化和农村的工业化；必须处理好农业与工业之间、工业发展与农业调整之间以及农业国与工业国之间的三重关系。

这是第一部从历史上和理论上比较系统地探讨和研究经济落后国家如何走上工业化道路的开创性著作，被国际经济学界认为是“发展经济学”的奠基之作，而张培刚也被誉为“发展经济学之父”。

（《光明日报》12.8 张春雷 夏静）

（作者：农业部原政策体改法规司司长）

我国土地制度与土地政策的走向

——从土地财政和土地金融说起

黄小虎

一、中外土地财政异同

近来，各界对土地财政议论较多。实际上，西方市场经济发达国家也存在土地财政。例如，西方国家的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主要依赖财产（地产、物业）税，高的约占地方财政收入的60%~70%，这是典型的土地财政。又如，西方国家普遍不直接对土地增值征税，但土地交易所得要缴纳所得税，实际上是间接对土地增值征了税，这也算是土地财政。再如，西方国家也有国有土地，但政府并不直接经营，需要经营的，有的（如加拿大）交给国有公司经营，公司要向政府上缴利润，这也是土地财政。

西方的土地财政，主要靠向存量土地资产征税，而我国的土地财政则主要依赖增量土地，这是一个很大的区别。存量土地资产面广、量大，税收收入可以预期，便于纳入预算支出和规范管理。增量土地的收入则难以预期，很难纳入严格意义的预算支出，也难以规范管理。而且，过分依赖增量土地的收入，会形成征地、卖地依赖症，导致政府行为扭曲，并陷入外延扩张的恶性循环。政府对存量土地市场，也缺乏经济调节手段。

我国这种主要依赖增量土地的土地财政，是在两个制度基础上形成的。一个是现行征地制度，另一个是政府经营土地的制度。征地制度各国都有，但政府经营土地制度则是中国特有的。市场经济发达国家，都不允许政府直接从事经营活动。例如在土地资源稀缺的荷兰，不仅土地用途管制十分严格，而且规定任何土地交易，政府都可以优先购买。但同时法律又规定，政府不得从土地获取任何收益。政府购买土地的目的，是为了控制房价，解决居民的住房问题²。就是说，荷兰政府的唯一职能，就是公共管理，不从事任何经营活动，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依靠税收。其他西方国家的政府，也大体如此。

我国政府征收农民的土地，用于经营获取收入，形成的土地财政规模越来越大。2009年全国土地出让收入1.6万亿元，约占当年地方本级财政收入的48.8%，2010年土地出让收入高达2.9万亿元，相当于地方本级财政收入的71.4%。³

二、关于土地金融

近些年来，城市建设资金中土地金融占得比重越来越高，已经远远超过了土地财政。这里所谓土地金融，是指政府把征收来的土地，到银行抵押或质押贷款。严格说，这样做并没有法律依据，是不合法的，但已成为普遍的趋势。

² 谭荣：“荷兰农地非农化中政府的强势角色及启示”，《中国土地科学》2009年第12期

³ 根据国土资源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有关数据计算

按官方统计，2010年我国地方政府各类融资平台，总负债10.7万亿元，⁴其中绝大部分以土地为抵押或质押，属于土地金融。有学者认为，官方统计数据偏低，地方政府实际负债额比统计数据高得多。

目前我国地方经济的发展严重依赖土地财政和土地金融，据刘守英等人研究，东部城市建设的资金构成，土地出让收入约占30%，土地抵押融资约占60%；中西部的城市建设资金，土地出让收入约占20%，土地收益权质押融资约占70%。⁵

与土地财政一样，土地金融也是以征地制度和政府经营土地制度相结合，才得以形成的。

三、矛盾积累经历了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现行征地制度是从计划经济演化来的，政府经营土地制度则是城市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的结果。这两个制度紧密契合，才可能形成土地财政和土地金融，土地财政大体形成时间是1998年以后，土地金融更晚一些。

先看征地制度的变化。

计划经济时期，国家征地的补偿费用不高，但对因征地而失地的农民，由国家予以安置。具体措施，一是“农转非”，农业户籍转为城市户籍；二是把农业劳动力安排到城市企事业单位就业，成为职工。在当时条件下，这种转变对农民来说意味着根本性的变化：由挣工分变为挣工资，退休也有了保障；由自己种口粮变为吃商品粮；由合作医疗变为公费医疗；子女由在农村上学变为可以到城市上学；运气好的，还可以享受单位分配的住房，等等。这种转变所体现的经济关系，是失地农民能在一定程度上，分享土地转变用途后产生的增值收益。在计划经济时期，国家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相对缓慢，加之有这样一套利益分享机制，征地引起的社会矛盾并不普遍、尖锐，多数农民还欢迎甚至盼望国家征地，把征地当做改变自身命运的机遇。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逐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国家安置难以实施了。一是个体、私营、外资企业大量涌现，对这些企业，国家不可能做人员方面的安置。二是国营企事业单位逐步改制成为独立法人，打破“铁饭碗”、“大锅饭”、“终身制”等，国家也难以安置了。即使安置，也不可能像过去那样有长久甚至终身的保障了，对农民而言，这样的安置已毫无意义。于是，对因征地而失地的农民，国家不再安置，改为提高安置补偿费标准。也就是说，凡国家征地，不管对部分失地还是完全失地的农民，一律实行货币补偿。但所谓货币补偿，却是延续了计划经济时期的做法，即由国家规定补偿标准。

⁴ 郑慧：《如何看待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中国经济时报》2011年7月27日5版

⁵ 参见蒋省三、刘守英、李青：《中国土地政策改革——政策演进与地方实施》，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版

补偿费用的具体构成是：土地补偿费、青苗补偿费、地上地下构筑物补偿费和人员安置补助费。其中，土地补偿费是按农业年产值的若干倍估算，大体属于农地的地价。就是说，农地改变用途后产生的增值收益，农民不能分享了；安置补助费也是按农业年产值的倍数来估算的，考虑的也只是农业劳动力的再生产。但事实上，农民一旦完全失地就不可能务农，而在农业之外就业，会有一个或长或短的过程，期间的生活成本会大大提高，靠农业劳动力的补偿费用，难以维持其正常生活。我国农村土地属于集体所有，过去土地补偿费主要由集体统一支配使用，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有的地方把部分乃至全部土地补偿费分给农户，即便如此，也维持不了几年生计。广大农民把这种单纯货币补偿的做法概括为“一脚踢”，可谓形象生动、一语中的。“一脚踢”以后，因征地而引起的社会矛盾逐渐突显。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刚刚建立的 90 年代初期，征地还是以国家重点项目的单独选址为主。国家重点项目，多为基础性、公益性建设，农民为此作出一些牺牲，在感情上容易接受；单独选址，多呈点、线状分布，涉及的农地面积和农户数量相对少一些，完全失地的农户更少；大量重点项目分布在农村地区，即使有少量完全失地户，其生活成本也比城乡结合部低许多；当时城市土地市场还没形成气候，农民更没有土地财产的观念。因此，尽管已经“一脚踢”了，但矛盾还不十分突出。

大约自 90 年代始，开发区热兴起，渐成燎原之势，到 90 年代中期已是遍及全国。开发区征地，属于批次（即区片）征收，一征就是一大片，导致完全失地的农民数量越来越多。开发区一般都处于城乡结合部，生活成本高，虽然就业机会较多，但农业劳动力素质低，找到稳定的工作并非易事，因此，失地农民普遍遇到生计困难。征地引发的社会矛盾，越来越突出了，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

90 年代中后期，党中央提出了城镇化发展战略，到 1998 年政府机构改革和换届以后，进入 21 世纪，这一战略才全面实施。但在许多地方党委和政府的心目中，所谓“城镇化”，就是大张旗鼓地搞城市建设和城市扩张。城市扩张要占用农地，城市建设的资金要靠征地后的“招、拍、挂”，于是批次征收愈演愈烈，被“一脚踢”出去的失地农民与日俱增。过去的开发区热中，虽然也有“楼、堂、馆、所”等建设，但毕竟还是以发展实体经济为主。而这一轮城市建设中，诸如那些可与日月同辉或比邻河湖之泽的行政中心，那些超国际水平的大广场、大花园、大酒店，那些穷奢极欲的豪华娱乐设施等等，如波涛汹涌，一浪高过一浪，如烈马奔腾，一发而不可遏。对这一类建设项目体现的利益取向，连普通市民都为之瞠目，广大农民更是心中沟壑难平。随着城市土地市场的日益火爆，农民的土地财产意识也日益觉醒，提出了按市场价补偿和允许集体土地进

入市场等要求，抵制和抗拒政府征地的极端事件普遍发生。因征地而引发的社会矛盾全面激化，成为一大社会难点问题。

再看政府经营土地是如何形成的。

上世纪 80 年代，我国逐步改革城市土地使用制度，主要改革方向是有偿使用土地。有偿使用的方式，当时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出租、入股等多种形式，其着眼点是搞活经济，而不仅仅是考虑增加政府收入。但进入 21 世纪以后，有关方面提出经营性土地一律“招、拍、挂”，使得城市土地有偿使用形式变为只强调出让（一律“招、拍、挂”，就是一律出让），其他多种形式不再是工作的重点。提出一律“招、拍、挂”的出发点，政治上是为了预防腐败，经济上则是为了增加政府收入。

我国的土地出让制，主要是借鉴香港的土地批租制。但香港的土地管理与土地批租（即经营），分属不同的部门，并且把政府的土地收益纳入基金管理，杜绝了支出使用的随意性。这一点，我们却没有学，可以说学香港只学了一半甚至不到一半，这是由当时的历史条件决定的。80 年代中后期成立国家土地管理局，负责统管全国城乡地政，逐步推行有偿使用土地制度改革。但国土局作为副部级机构，权威不够。在长期计划经济的惯性作用下，许多地方政府和一些中央政府部门，不买国土局的账，不愿实行有偿用地制度，改革进展缓慢，自然谈不上形成土地财政和土地金融。在当时的这种背景下，土地管理部门顺理成章地承担起国有土地的经营职能，集裁判员（管理）与运动员（经营）于一身，可以说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1998 年政府机构改革，成立了国土资源部，土地管理升格了，各地方换届后新上来的领导干部，多没有计划经济时期无偿用地的包袱，城市土地有偿使用制度才真正确立起来，政府经营土地的局面也因而全面建立，并与征地制度互为表里，逐步形成了我们现在多有批评的土地财政和土地金融。与此同时，政府经营土地特别是管理土地的部门经营土地的弊端，日益显露出来了。

以上对历史的回顾说明，现行征地制度和政府经营土地制度相结合，有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矛盾的积累也有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四、我国现行征地制度和政府经营土地的弊端

现行征地制度与政府经营土地制度相结合，形成土地财政和土地金融，是政府主导片面追求 GDP 的发展方式的具体体现，也可以说是旧发展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发展方式，有利也有弊。

近十几年间，我国的城市建设突飞猛进，其奥秘就在各城市政府通过征地和经营土地，积聚了大量建设资金。城市经济飞速发展，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不断提高，带动了周边农村经济的转型与发展，吸引了大量落后地区的农民进城务工，这都是不容否定的正面效应。

在取得辉煌成绩的同时，所积累的经济、环境的、社会的乃至政治的矛盾越来越多，现在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了。

第一，土地利用粗放，浪费严重。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最近十几年间，我国城市快速发展，主要依托于土地的外延扩张。据土地资源战略课题组研究，1996年至2008年，城镇用地增长了52.21%，增加的土地主要来自于农村。据刘守英对相关统计数据的研究，2000~2007年间，全国城市建成区面积年均增长率为6.44%，而人口城镇化率的增速仅为4.55%，土地城市化速度比人口城市化速度快出两个百分点⁶。我国的统计指标，将大量常驻流动人口纳入城市人口，加上“市管县”、“县改区”，使许多农业人口“被城市化”，因此有关城市化的统计有很大的“水分”。就是说，土地城镇化的速度高于人口城镇化的速度，实际上大大超过两个百分点。

城市土地扩张了很多，人却没有增加那么多，人均占地就多了。我国城市人均土地面积，2000年为117平方米，2008年增加为134平方米，远高于一些发达国家平均82平方米的水平。外延扩张的结果是土地利用浪费、粗放。一方面，城市存量土地大量闲置；另一方面，土地利用效率低下。我国土地利用最集约的上海，2006年每平方公里工业用地产出约为20亿美元，而香港10年前即1996年的工业用地的产出是每平方公里30亿美元。近些年上海的工业用地的产出提高到每平方公里约80亿美元，而香港已达300亿美元，日本东京2001年已达每平方公里523亿美元。我国工业用地的容积率，低的只有0.3%，高的也只有0.6%，而国际平均水平为1%。因此，我国城市土地的工业用地所占比重普遍较高，为20%~30%甚至更高，而国际平均在15%以下。⁷

城市快速扩张，不仅导致耕地资源流失，还产生水资源稀缺、能源压力、环境污染以及挤占生态用地等问题，对土地生态安全也构成威胁。我国已是世界上生态脆弱区分布面积最大、脆弱生态类型最多、生态脆弱性表现最明显的国家之一。

城市土地外延扩张、利用粗放，与现行征地制度和政府经营土地制度有直接关系。国家征用农民的土地，补偿标准很低，大大降低了城市建设与发展的成本。相比而言，利用城市存量土地，拆迁、改造的成本要高得多。因此，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都热衷于征地，而不愿意利用存量土地。严格保护耕地早已成为国策，节约集约利用土地的口号也提出多年了，但耕地保护不住，城市土地粗放浪费的趋势仍未根本改变，其主要原因就在这里。

第二，透支未来。

土地财政的主要构成是土地出让金，及与土地有关的税收，这些税收如建

⁶ 刘守英：《中国工业化、城市化与农地制度和农业经营格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报告征求意见稿（未发表），2011年5月

⁷ 参见邹玉川：《眼睛向内、深度挖潜，全面推进土地集约利用》，在第10届全国政协18次常委会的发言；刘守英：《土地制度改革与经济成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报告征求意见稿（未发表），2010年8月

筑税、房地产税，都是以土地出让为源头。土地出让金是若干年期的土地使用权价格，实际上是政府向企业一次性收取若干年的地租。而地租是对企业当年利润的扣除，属于社会一次分配范畴。对企业而言，一次集中交纳若干年地租，意味着预支未来利润，属于负债经营。现实生活中，很多企业是靠银行贷款支付土地出让金，负债的性质一目了然。即使是用自有资金来支付，本质上仍然是负债。企业如果经营得好，有稳定的盈利，可以逐步清偿这笔负债；如果经营不好或者破产了，这笔负债就不能清偿，如企业再生产因此中断，最终还会转化为银行的坏账，成为整个社会的问题。按有关制度规定，企业可以把剩余年期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出去，使负债得以清偿，甚至可以从中获利。但是，这不过是负债在企业之间的转移，转移的结果，负债的规模还可能被放大。

房地产业的情况有些特殊，开发商在出售住房的同时，把对土地使用权的负债也转移出去了，甚至还可能从中大赚一笔，但接手这笔负债的不是企业，而是消费者。一般工薪阶层都要向银行贷款，才能支付房价，负债的性质也是一目了然。消费者要用今后数年乃至数十年的收入，才能逐步偿还这笔负债，个人和家庭的消费能力、生活水平也会因应改变。期间，如果因变故而无力偿债，不仅是个人和家庭的不幸，也会增加银行的坏账，成为社会的问题。

从整个社会的角度看，政府出让土地所获得的每一笔收入，都有一笔企业或个人的负债与之相对应。就是说，政府用土地出让金搞建设，是以透支用地企业或个人的未来收益为前提的。前已述及，现在地方财政与土地有关的税收，是以土地出让为源头而展开而增长的，因此不难做出如下判断：所谓土地财政，实质上是一种依靠透支社会的未来收益，谋取眼前发展的方式。用形象的说法，就是“寅吃卯粮”。⁸

土地金融则是政府直接负债经营，用未来收益逐步偿还，本质上也是“寅吃卯粮”。有的一届政府的负债，下届甚至下几届政府都不一定能够偿还。

建立在企业或个人信用基础上的透支，是市场经济的题中应有之义，有利于调动企业和个人的探索、创新精神，有利于增加经济发展的弹性与活力。凡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各类透支活动极其活跃。例如，金融活动证券化产生的各类衍生金融产品，本质上都是透支，说白了，就是用别人的钱谋自己的发展，或是用明天的钱谋今天的发展。这对促进市场经济的繁荣，确实起了重要作用。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很多企业和个人，也都有类似的经历。但凡事都有度，这个度就是实体经济。如果脱离了实体经济的制约，一味去搞什么“资本运作”、“资本经营”，玩所谓“资本腾挪术”，其结果必然会对经济社会造成严重的危害。美国次贷危机重创全球，即是最新的明证。

透支未来的发展方式，逐步积聚着极大的金融和社会风险。如果说土地财

⁸ 国内最早提出出让金是“寅吃卯粮”说法的，是作者本人。参见黄小虎：“防止片面追求政府地租收入最大化”，《中国经济时报》2003年1月1日5版

政的风险是由社会分散承担的，那么土地金融的风险，则集中于政府，孕育着政府财政和信用的危机。据有关研究，地方政府负债的安全线，一是负债总额（包括实际负债和或有负债）不能超过当年地方财政总收入的70%；二是当年到期的债务本息总额不能超过一般预算收入的30%⁹。2009年，国家审计署对18个省区的城市负债情况进行了审计，有13个省的融资平台贷款余额超过该省财政总收入，有的高出两倍以上。从债务余额与当年可用财力之比衡量，省、市本级和西部地区债务风险较为集中，有7个省、10个市和14个县本级超过100%，最高的达364.77%¹⁰。政府的偿债能力严重不足，于是靠借新债偿旧债来拖延。这种局面，目前仍呈加剧之势。例如保障房建设特别是廉租房和公租房建设，财政资金缺口很大，各地方想各种办法从市场融资，其中大多仍靠土地融资。这些投资，靠廉租房和公租房的租金收入，是不可能偿还的。这种局面显然难以持续，如不加以改变，难免有一天会发生类似美欧那样的债务、金融危机。

第三，社会分配不公。

改革开放30多年，“蛋糕”做大了，但是分配不公，这是当前的突出矛盾。导致分配不公的原因很多，现行征地制度和政府经营土地，是其中十分重要的原因。

首先看城乡差距。

一方面，国家不允许集体建设用地进入市场，极大地限制了农民自主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积极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任何产品的分配，都以生产条件的分配为前提。纵观30多年来，凡集体经济搞得好的或经济发展快的农村，几乎无一例外都突破了现行征地制度的限制，集体建设用地或公开或隐蔽地进入了市场，实现了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而我们的征地制度，却始终无视市场经济的要求，固守对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的“身份”限制，实际上是限制广大农民土地财产权的实现，导致他们在社会分配中，处于弱势地位。我国农民人均纯收入中，财产性收入只占约3%¹¹，远低于城市居民。现行征地制度是造成这种情况的重要原因。

另一方面，国家征收农地，不管是用于基础性、公益性建设，还是用于经营性项目，一律按农业产值的倍数补偿，由政府定价，农民没有谈判地位。前几年有人研究，政府出让土地价款中，征地补偿费仅占不到10%¹²。农民失去赖以生存的生产资料，仅靠土地补偿费难以维持生计，陷于贫困，是普遍发生的现象。政府经营土地，用卖地收入搞城市建设，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提高了，政府工作人员的工作、生活条件更是极大改善，而被征地农民却无缘分享城市

⁹ 陈昆才：《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规范箭在弦上》，《21世纪经济报道》2010年1月21日

¹⁰ 时红秀：《地方债的风险有多大？》，《中国经济时报》2010年7月6日12版

¹¹ 周其仁：《增加中国农民的家庭财产性收入》，在“2009中国农村金融论坛”的演讲，新浪财经2009年10月28日（<http://finance.sina.com.cn/hy/20091028/11196893787.shtml>）

¹² “中国征地破局”，新浪新闻中心2008年11月23日（<http://news.sina.com.cn/c/2008-11-23/131816709051.shtml>）

文明。城乡差距更加扩大，导致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

其次看城市内部的贫富差距。

当前住房短缺、房价高昂，是大中城市普遍面临的突出问题。这个问题与征地制度和政府经营土地制度也有很大关系。一方面，不允许集体建设用地开发房地产，客观上使开发商形成自然垄断地位，可以肆无忌惮地抬高房价，谋取暴利。不断飙升的房价，使少数开发商和投机炒房者富者愈富，而广大中低收入阶层则贫者愈贫，或者成为“房奴”，或者陷入“蜗居”、沦为“蚁族”。另一方面，政府经营土地，一律“招、拍、挂”，客观上也助长了房价“泡沫”的形成。

再看国民收入的积累与消费。

本世纪初，就有财政专家研究提出，当时我国政府的各种收入加起来，已占 GDP 的 30% 以上，达到甚至超过发达国家的水平¹³。政府收入占 GDP 比重过高，一方面导致居民特别是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另一方面抑制了社会投资。后来，中央采取许多措施，大力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但总的趋势并未根本改变。2010 年有学者研究表明，2009 年我国全口径政府收入实际已突破 10 万亿，约占 GDP 的 32%¹⁴。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政府通过征地和经营土地获取数额巨大的土地出让收益。2009 年 1.6 万亿土地出让收入，约占当年 GDP 的 5%；2010 年土地出让收入高达 2.9 万亿元，占当年 GDP 的 7.3%¹⁵。

政府的收入过高，严重抑制了居民收入的正常增长，导致消费需求不足。上世纪 80 年代初，我国消费率曾达 62%，之后呈下降趋势，2005 年降为 52%，其中政府消费占 14%，居民消费仅为 38%。到 2008 年，居民消费降为 35.3%，2010 年进一步降为 33.8%。金融危机爆发前，世界平均消费率为 78~79%（美国约为 85%）¹⁶。无论与历史水平相比，还是与世界水平相比，我国的消费水平特别是居民消费水平都实在太低了。消费需求不足，经济发展主要靠投资和出口拉动，发展的成果不能由全体人民共享，这样的发展是难以持续的。

五、土地制度的未来走势

党的 16 大以后，中央对我国所处的发展阶段，作出新的重大判断，提出科学发展、统筹发展的新发展观，提出转变发展方式的战略任务。中央领导多次指出，我国从总体上已进入“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发展阶段。特别是十七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明确提出改革征地制度和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土地市场的任务。这都为今后土地制度改革指明了方向。

¹³ 安体富：“当前世界减税趋势与中国税收趋向”，《经济研究》2002 年第二期

¹⁴ 汪德华：《全口径财政收入超 10 万亿说明什么》，《第一财经日报》2010 年 6 月 28 日

¹⁵ 根据国土资源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有关数据计算

¹⁶ 参见乔为国：《中国高投资率低消费率研究》，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 年版；李建、兰莹：《中国消费率持续下降主因：国民收入分配失衡》，《经济研究信息》2006 年 2 期；李颖：《我国消费率变化的特征及启示》，《宏观经济管理》2011 年 4 期；王一鸣：“坚持宏观调控与市场机制的统一”，《求是》2011 年 24 期

在中央精神指引下，各地纷纷探索征地制度改革，创造了许多新做法、新经验。地方的许多探索，大大突破了现行征地制度的桎梏，凸显了法律、制度层面改革的滞后。总体看，改革已是大势所趋、箭在弦上。

改革的理想模式，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赋予农民完全的土地财产权。其要点，一是构建城乡统一的土地市场，允许农民在国家规划引导下，自主地参与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二是对必须征为国有的土地，赋予农民谈判权，参照市场价协商补偿标准和补偿方式。由于利益关系调整比较大，改革不一定能一步到位。但方向应该明确下来，不能含含糊糊。改革方案，应有一定弹性，尽可能反映各地方的经验，鼓励地方继续探索，避免“一刀切”的弊病。

对于改革政府经营土地制度，目前一些地方试行的工业用地年租制等，已经是有所触及，但还少有根本性的改革探索。总的看，这方面的改革还处在理论探讨层面。从趋势看，这个制度也是非改不可。否则征地制度改革也可能改不下去。任何经营活动，都是以追求收益最大化为目的，政府如果从事经营活动，也不可能例外。政府经营土地的收入，来源于农地转为建设用地的级差收益。为了保证这个收益的最大化，很自然地要压低征地费用，并且对农村集体土地进入市场加以限制。可见，问题的主要根源，在于政府成了市场主体，在于政府以管理手段实现经营目的。这个问题不解决，单纯改革征地制度，一是恐怕很难改得彻底，二是即使是不彻底的改革措施，落实起来也会阻力重重。我们说，现行征地制度与政府经营土地制度互为表里，道理就在这里。

在我国实现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中，必然会有一个政府主导、政府直接参与经营的发展阶段，但政府最终必须退出直接经营活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才可能真正确立、完善。否则，国家将面临滑向官僚、权贵资本主义的危险。

改革政府经营土地制度，涉及干部制度、财税制度等更深层次的问题，难度更大。可以考虑分步实施，第一步应是把经营土地的职能从土地管理部门分解出去，管理部门只负对城乡土地按统一规则实行管理的责任。经营土地的职能则交由另外的部门承担，至于如何承担，可以有多种方案，逐步实验、摸索、完善。

（作者：国土资源部土地规划研究院原党委书记）

在城镇化过程中要处理好农民的土地问题

卢文

编者按

卢文同志已高龄90岁，仍心系“三农”。2011年8月底突患肺炎和大面积的心肌梗塞症，送医院抢救，昏迷一周多，住院两个多月，在家休养两个多月，稍好，仍孜孜不倦继续写文章。这是最近写的文章。

目前和今后二三十年内，我国将处在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和农业现代化协调推进的时期。2011年，我国的城镇化率达51.27%，现在外出务工的农民达1.64亿，今后还将有几亿农村人口转入城镇，预计到2020年我国城镇人口将超过8亿。这是一个历史性的社会大变动。在推进城镇化的过程中，要解决许多问题，其中处理好进城农民的土地权益问题是值得注意的重点之一。

一、我国城镇化的特点

随着工业化的发展，社会必然走向城镇化，这是社会发展的共同规律。但是我国的城镇化和西欧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的历史发展具有不同的特点。

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在工业化的过程中，使农村的小农陷于破产，盲目大量涌入城市，成为城市贫民，作为产业后备军，经过痛苦的过程，逐步演化成工人和市民。这些人绝大多数涌入大城市，使大城市迅速膨胀，城市病日益严重。这是一条自发的、痛苦的、漫长的道路。

我国城镇化的道路与此不同：

（一）我国农民在农村有集体土地，每个农户都享有长期承包经营土地的权利，成为社会经济保障。他们到城市就业，不是因为已在农村破产，而是因为农村人口众多，人均拥有的土地和农业资源有限，难以在农村获得更多的收入和更好的发展，而城市则有更多的就业门路，能获得更高的收入，得到更好的发展，能改变生活环境和社会地位。他们大多在城乡有两头家，过年过节常回家去。在城镇中遇到困难时，还可以回乡务农。有些人想在城市挣点钱便回乡过较好的日子。

（二）我国农民在农村发展乡镇企业，主要是工业和其他非农产业，很多农民进入其中工作，变成非农产业劳动者：在乡镇企业大量发展的基础上，一些地方集中乡镇企业建成小城镇，或是把乡镇企业迁到小城镇中落户，其从业人员也进入小城镇，大多成为城镇居民。于是小城镇不断增加、扩大和提高，星罗棋布。

（三）我国的城镇化是在国家的全面规划和合理布局下，以大城市为依托，以中小城市为重点，以众多的城镇接连广大农村，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不是盲目发展大城市。因而把城市化称为城镇化。

（四）有序地引导组织农村多余劳动力进城务工就业。国家实行城乡统筹协调发展的方针，改革隔离城乡的户籍制度和城乡不同的福利待遇。建立劳动市场和各种中介组织，提供就业信息和条件，帮助进城务工的人员解决转移就业的种种困难和问题，尽量减少盲目性，降低转移成本。承认入城务工人员为产业工人，帮助他们逐步转变为城市居民，允许享受市民的待遇。多方培训进城务工人员，提高他们文化、技术水平，使之顺利就业，尽快成为熟练劳动者

和骨干。

(五) 鼓励和帮助入城有所成就的农民工回乡创业, 进一步发展农村经济, 推进农村建设。

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之路, 已经取得明显的成效。

二、农民进城遇到的问题

进城务工的农民, 就地域来说有两种: 一种是在附近的小城镇从事非农产业的工作, 离土不离乡; 一种是跨地区、跨城乡进入大中城市, 离土又离乡, 流动性较大。前一种在本社区集体企业中工作的人, 就业、待遇、分配、生活都较为稳定。而跨地区进入大中城市务工的农村劳动者则面临很多不确定的因素。

城市经济和农民进城工作、由农民变成城市居民, 并不是一帆风顺和很快就能实现的。这种历史性社会大转变过程遇到许多周折和问题。

首先, 是劳动力的市场竞争很激烈。在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下, 每年要安置新增的成千上万劳动力, 压力很大。城镇要安置的人不少; 农村劳动力多, 劳动技能偏低, 约有八成无专业技术职称和未接受过职业技术培训, 在竞争中处于劣势。很多进城的农民不易很快找到长期固定的理想的工作长时间安定下来, 常常不断变换工种和地区, 有的跑了十多个城镇。在国际国内的市场竞争中, 城镇经济和某一行业、某一企业不是都经常景气的, 往往会出现萧条与危机。遇到这种情况, 企业就会解雇工人, 首当其冲的是农民工。这样, 农民工就必须在农村留下一条退路。

其次, 是入城遇到诸多困难和不便。城市的住房很贵, 入城务工人员很难买得起。目前, 各城市虽然修建不少廉价保障房, 但是, 农民工不易得到, 而且住房面积较小, 房租也不低, 还要交物业等诸多费用, 低收入的农民工感到难以承受。很多农民习惯于农村的宽敞、开阔、自由的环境, 城市住房多在楼上, 面积不大, 行动不自由, 没有地方种自食蔬菜, 不能养鸡、养猪, 感到很不适应, 还是留恋农村的居住条件。很多农民工还具有农村的意识习惯, 如不讲究卫生, 不遵守城市规章等, 很多习惯不易一下改变过来。很多市民对入城的农民工还有种种习惯性的歧视, 令外来者感到不顺心, 难以相处。现在, 发达国家很多城市人都想回归自然, 在乡间寻找田园风光: 原来从农村来的人, 自然会念念不忘农村的田园生活, 对土地难舍难分。

再次, 是遇到制度机制上的障碍。政府虽然改革了户籍制度并一再宣布入城农民工和市民享受同等待遇, 而实际上还存在差异, 公共服务不均等, 如工资福利、小孩上学等问题, 有 52% 的流动人口未参加任何社会保障, 养老保险异地转移接续难等等。

复次，目前来自农村的农民工都是青壮年人，老年人和绝大部分小孩都留在农村，形成两头家。进城的人逢年过节都紧张地回家，两头奔跑。不少人在城市有了成就还回乡创业，建设新农村，带动同乡致富。

新一代青年农民工现在约占农民工总数的 60%，他们多数文化水平较高，易接受新技术和新思想观念，很快习惯于城市生活，较快融入城市，想长期留在城市，但他们还要照顾老一代，要使新一代完全占绝对多数还要很长的时间。

在上述情况下，进城的农民工就和原来的农村有密切的联系，必须根据这种情况，处理好他们在农村的承包地和土地权益，在这基础上实现农业现代化，使城乡协调和谐发展实现城镇化，使农民顺利地实现向市民的历史性转变。

三、要妥善地处理好进城农民工的土地权益

我国长时间是农业国，农民长期在贫困的条件下劳作和生活，祖祖辈辈都和土地打交道，对土地具有深厚的感情，视土地为命根子。

有人认为，我们要实现城镇化，就要进城取得户口和居住权的农民交出土地，以承包地换城市住房，变成完全脱离土地的市民。有些地方政府就以此提出种种名目，强征、强占农民的土地。这是不对的。我们不能重复资本主义城市化以剥夺农民土地为前提的道路，形成和失地农民的对立，种下社会危机。

也有人认为，我们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就要发展土地规模经营，就要改变家庭承包经营，收回农民的承包地，集中搞大规模的土地经营，实行机械化耕作。这也不对。农业现代化需要使分散落后的小农经济消亡，但不需要消灭家庭经营。很多发达国家的现代农业，都是在家庭经营的基础上搞的。我们可以在现有土地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上，通过自愿合作与联合，扩大土地规模；也可以在家庭经营基础上，发展完善社会服务，扩大经营规模，由此实现农业现代化。温家宝同志在 2011 年 12 月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将来农业经营形式会多样化，但家庭经营在任何时候都是最基本的形式。”

也有人认为，中央提出鼓励农民依法、自愿、有偿流转承包地，发展多种形式的土地规模经营已经多年，而现在全国土地流转量仅占耕地总面积的 10% 左右，比例很少，必须改变这一政策，以行政手段加以调整，加速土地规模经营的发展。这是行不得的。这样会严重挫伤农民的经营主动性和生产积极性，重复过去农业合作化的错误。

还有人认为，现在入城务工的人很多撂荒了承包地，说明农民不想种地，应把撂荒的土地收回，另交别人或由集体耕作。目前各地农村确有不少入城务工的人丢荒了一些承包地，但这并不能表明这些农民不想要这些土地。相反，它表明农民不愿意放弃这些承包地。因为，他们如果把这些地转包给别人或交集体，一旦在城市工作不顺利，临时回乡，就不易要回土地耕作。把土地丢在

那里，虽说减少点收入，但是何时回家都有田可种，有生活保障。

温家宝同志在上述农村工作会议的讲话中强调：“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等，是法律赋予农民的合法财产权利，无论他们是否还需要以此来作基本保障，也无论他们是留在农村或进入城镇，任何人都无权剥夺。”

解决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土地问题的方式和方法，在改革发展的过程中，农民已在实践中根据各地的实际创造出多种形式：

（一）入城务工和离乡的农民，可以依法、自愿、有偿地把承包地转让给亲友、种田大户，或交集体找人接收经营。对一些外出后撂荒土地的人，要进行细致的思想工作，让他自愿把土地流转，或帮助他实行流转。这里重要的一点是，切实保证外出农民一旦回乡时，能有田种或能得到保障生活的收入。

（二）土地承包者，按生产发展的需要，通过自愿协商，组成合作社或联合体。有的以土地入股分红，统一经营和分配；有的按项目分别实行有统有分的经营，既发挥自主经营的积极性，又发挥联合的优越性；有的以土地作股，参加某经济实体，由其经营，按股分红。

（三）在家庭独立承包经营或联合一批独立经营的家庭的基础上，找供种、耕作、施肥、植保、科技、水利、收割、运输、加工、销售等单位提供完善的服务。这样，家庭人口外出，家中劳力弱少也不影响生产。这需要发展和完善各种服务体系。

（四）建立农工商综合经营体。一般是以某个经济实体为龙头，以某种农产品为核心，联合有关的生产农户（不改变其土地承包关系），或农户组成的合作组织，和它们订立生产合同。由龙头联系有关的信息、供种、科技、金融、加工、销售包括外销）、运输、储藏等单位，为农户或合作组织提供服务，保证农户的生产、加工、销售、收益。这种综合经营体一般有两种形态：一种是龙头和农户之间只是商品买卖关系，龙头和农户各自独立核算，这往往会出现龙头只顾赚钱的现象；另一种是龙头和农户之间有利益共享的关系，龙头获益，农户也得益，对农民较好。

（五）城镇工商资本下乡，租赁农民的承包地办公司，给予农民租金，雇请出租土地的农民在公司指挥下劳动。这样农民可以得到地租和工资的双重收入，也可以提高土地产出率和劳动生产率；但农民却由自主经营者变成被动的雇工，使农村社会结构发生深刻的变化，要慎重考虑。

（六）在经济较发达的地区，有少数（全国有几千个）社区合作组织，实行统一经营，把土地全部集中连片，由专业队耕作，土地收益和其他经营一起统一核算和分配。最著名的是江苏江阴的华西村。实行这种体制的单位，一般

要有三个条件：（1）有出色的公道、能干、为本单位成员所拥戴的领导干部；（2）有发达的集体乡镇企业，成为该单位的经济主体；（3）有健全的经营组织，善于经营管理，能为全体社员带来丰厚的收益。这不是很多地方都具备而能够普遍推广的。

（七）有些经济较发达的地方，社区集体经济组织把集体土地按本单位人员（包括老幼）情况，民主评定折股，土地由本集体公司集中统一经营，集体土地所有者成为股票持有人（股东），不论到什么地方、做什么工作，都可以按所得股份分红，既保持土地集体所有者的权益，持股者又可以自由流动和自由就业。这也要具备上述三个条件，难以普遍施行。

（八）城市不断扩大，很多城郊农村陆续变成市区。城郊区在并入市区时，不宜把农民集体土地全部变为国有，可以留部分让原集体组织或农民按市区的发展规划，发展集体经济或非公有制经济，让原土地所有者获得收益，改善环境和生活。

此外，可能还有其他形式。无论采取什么形式，基本点都是使农民从所有和承包的土地中得到利益，并确立制度上的保障。

在经济不断发展和深化改革中，农民还将在实践中创造出更多新的土地关系形式。我们要不断总结和完善农民的创造，制定新政策，确立新制度，促进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平稳协调发展，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 and 政策。

（作者：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

建设发展小城镇是提高城镇化率的有效举措

林 干

一、建设发展小城镇有利于农村人口转移

尽管我们已进入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按人均 GDP4400, 美元，仍在世界排位在百位上下摆动。发达国家农村人口均在 10% 以下，而我国农村人口比重依然较大，实际情况农村人口约占 60%，贫困人口按现行标准约为 1.28 亿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越来越大，达到 3.2 : 1，因此，只有人均 GDP 上来了，农村人口降下来，城镇化率提高了，才有可能使农村更为富裕起来，实现小康社会。

小城镇一般指县（市）乡镇两级政府机关驻地以及旅游景点、交通要道集镇和繁华村镇。全国约有 2861 个县市，46369 个乡镇，是属于建设发展小城镇范围。小城镇是农业和农村经济全面发展的基础，是城镇化道路的重要途径，也是带动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大战略。无论从小城镇人口容纳量，农业资源匹配、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综合开发、现代农业等都有很大潜力。把小城镇建设好、发展好，就有可能就地转移更多的农村人口。提供了有利条件。

根据“十二五”期间，我国城镇化率将从 47.5% 提高到 51.5%，这就意味着每年将有大批人口转向城市，让农民到城里住，享受同城里人一样的生活，这确实是民生的一件大事。使农村人口举家带口到城市来，并不是一件容易事，只能循序渐进，不能急于求成。假如每年城镇化率提高一个百分点，每年将有 2000 万农民连家属进城，需要解决就业、住房、社保、教育、医疗等问题。安置房子、修马路、办学校、办医院、修水电、公共服务设施都要建，这么多大的工程，也难以应付。一些大中城市已经出现人口密度大、交通拥堵、环境污染、副食品供应偏紧局面。即使把符合条件的农民转移到城市就业和落户，只是解决了一个进城的门槛，但农民的生存条件就不是那么容易一步登天。

在城市建设上，这些年来我们重视了大中城市，忽视了小城镇的建设和发展。东部沿海地区小城镇建设发展好些，而中西部地区建设发展相对滞后。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推进，小城镇能够吸收更多的农村劳动力，梦想在家门口上班，收入也不少，还可以照顾家。特别是到外地打工的农民，孤身一人，孩子、媳妇留守农村，孝敬不了老爹老娘，每年春节期间农民工返乡成为人口流动大迁徙，深受买车票难、坐车难，而且受雨雪冰冻之苦。如果能在当地小城镇打工，可以避免这些困苦。“要让 80% 以上农村劳动力进入工业，让农民进厂不进城，离土不离乡，不再为生活焦虑，提高幸福指数”这是为百姓干实事的河南省新乡市唐庄乡党委书记老党员吴金印所探索农村致富的途径，2011 年河南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累计达 2465 万人，其中省内转移 1258 万人，省内就业农民工人数首次超过省外，让更多的农民在“家门口”就业，逐步成为现实。意味着河南在承接产业转移解决农村劳动力转移方面，不但有了量的突破，而且有了质的提升。

什么叫城市化，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亚洲研究中心主任阿瑟·胡塞因认为城镇一个重要特点是人口密度。如今许多被称为农村的地方按人口密度标准已经表示城镇化了。另一方面有的学者认为城市化能够享受现代化各种益处，生活更加便利。目前在广大农村中，孕育着一大批像天下第一村华西村、山东第一大镇沈泉庄、北京最富韩村河，住上了楼房、有了工厂、有了公共设施，交通便利，商业、金融、教育、医疗一应俱全，城市有的这里都有，同城里人一

样享受着城市化生活。因此，农村兴起的城市化正在向我们走来。诚然大城市要发展、中等城市也要发展、小城镇更要发展。30年前我曾在罗马担任中国常驻 FAO 代表工作了三年，有幸在意大利走访了小城镇发展，当你看到小城镇建设的错落有序、整洁美观，公共设施、公益事业、现代化功能和各种服务一应俱全，会感到与大城市没有两样。每逢节假日，四面八方和大城市的人到小城镇度假旅游、休闲聚会，使人流连忘返，对小城镇十分青睐。朋友告诉我，是意大利政府重视发展小城镇的结果。

二、建设发展小城镇有利于农业和农村经济全面发展

进入新世纪以来，全世界城市发展最快的地方在亚洲，中国和印度又是快中之快，中国城镇化率已经接近 50%，如今有一半住在城镇里，达 6.65 亿，城市化速度和规模堪称世界第一如今中国有 60 个城市人口超过 100 万，可整个欧洲超过 100 万人口的城市仅有 35 个。城市发展过快过猛过大，如何解决庞大城市人口压力是值得研究的紧迫课题。建设发展小城镇不但没有像大中城市人口过多的压力和弊端，而且发展尚有很大空间，因此，要做好发展小城镇这篇大文章。

我国是一个几千年的农业大国，又是人口众多的大国。目前这 13 多亿人口中，从统计数字看，城乡各占一半，实际农村人口约占 60% 以上。对大宗农副产品，如粮食、副食品、工业原料、出口农产品等仍依靠农村人口来生产供应，就是这样，仅能维持一个自给自足的局面，在未全面实现农业规模化、农业专业化、农业现代化，农村还需要一定的劳动力作支撑来生产大量的农产品来保证供给。在一些地方农民外出打工，土地耕种只能靠弱质劳动力补充，人们形容为“三八六一七八”主力军（三八即妇女、六一即儿童、七八即七老八十的老人），这种状况长此下去无法实现农业发展的任务。如果把小城镇发展起来，两难的境况就会解决好。我们的城市化不能照搬西方国家的城市化，也不可能把农村人口减少到最低限度，要根据中国的国情，建设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城镇化。我们的广大农村在革命和建设时期人民做出了巨大贡献，备战备荒为人民产生了立竿见影的效果。战争年代有了农村，保存、壮大我党的力量，在灾荒年间（如三年困难时期）解决了人民的吃饭问题，我们是一个幅员广大的国家，都集中到城市来也不是个办法，一旦发生难以预料事端就措手不及，因此，保持农村一定规模是完全必要的。有一个材料说：从 1952~2000 年农民向国家贡献 36 万亿元。新中国成立以来为国家建设提供了 4 亿亩土地，还为国家提供了大量农产品、畜产品、水产品，同时为城市建设发展提供了大批生力军，为国民经济的快速持续健康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和小城镇的建设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将会更大的全面发展。

小城镇是基层经济发展基础，资源有待开发利用，发展建设尚有一定的潜力。一是一、二、三产业需要进行合理配置，乡村工业空白、发展缓慢；二是农林牧副渔生产，靠出售生产原料，大都初级产品，价值低、收入少，未形成深加工、精加工，提高附加值；三是农村经营方式大多处于一家一户为单位的小农经济，生产未形成规模化；四是由于地方财政困难，国家支持有限，难以向地方投入更多资金，致使农业基础设施、农田水利建设、农村道路、农产品加工跟不上，直接影响农业发展；五是一些地方农民工大量外流，远到深圳、广东、沪、浙、京、津地区打工，农村劳动力壮年很少，只能靠弱智劳动力干农活，不可能用新技术装备农业，生产效益极低，直接影响农业的发展。

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推进，全国已有近万个行政村的经济收入达到1亿元以上，其中23个村达到100亿元以上，最高的华西村达到500亿元，农业和农村经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改变为农村城镇化提供了广阔前景。一村一制的有以经营农业为主的集体经济制度，开发利用农业资源进行综合开发。一村二制的有围绕农业办工业，办好工业促农业，形成以工建农机制。一村三制的有组成一些有资金、有技术、有实力的集团参与农村经营。一村四制有吸收海外三资企业合作，走向国际市场，生产产品在国外销售、他们的共同点紧紧抓住农业不放松，亦工亦农亦商以效益为中心，以集体经济为主，充分发挥集体力量走共同富裕道路，农村劳动力就地利用起来，几乎没有到外边去打工，老百姓过着同城里人一样的生活，并不感觉在农村，真正实现了农村城镇化的梦想，为农业和农村经济全面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开阔了广阔前景。

三、建设发展小城镇，有利于县域经济的发展

提高城镇化率，县域经济是基础。只有把县域经济做大做强，才有可能解决农村人口过多的问题。县、乡镇、村互为联动是发展经济的动力。县域经济包括一、二、三产业和工、农、商各业包含着生产、分配、流通、交换供应和消费、再生产的各个环节，就整个农业生产而言，县、乡镇、村和广大农民担负着全国13亿人口的吃饭问题，并为工业、出口、消费提供重要的原料。乡镇企业、民营经济和各类专业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壮大为农村创造了大量财富和吸纳大量农村劳动力，因此，县域经济是整个国民经济的基础，把县域经济搞好了，对缩小城乡经济差距，就地安排农村劳动力就业，实现农村小康，繁荣城乡经济有着重大意义。2010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达24223万人，其中外出农民工达15335万人，本地农民工8888万人，收入水平农村人口收入5919元，城镇居民收入19109元，相差悬殊，农民要富裕，除了国家的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外，只有走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县域经济是关键。

搞好规划。县域经济发展规划应与小城镇发展和新农村建设结合起来，开拓创新，以科学发展观因地制宜地提出全面发展目标和任务。规划中首先要摸清家底现状，防止一哄而起，对每一个项目要认真负责，世界银行对项目要求十分严格，要进行一系列的可行性论证，一般要经过认定、准备、评估、谈判、实施、监督、审核等六个阶段。把可能开发利用的资源，发展优势，资金筹集、技术力量逐一落实。突出优质产业、提高品牌产品，可以实行一村一品、一乡（镇）一业，围绕着龙头产业大力发展专业村、专业乡镇，形成资源特色相适应区域格局。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重点，亦工亦农亦商，一、二、三产业协调发展，把县域经济打造成最具活力，使农民离土不离乡进厂不离县致富的希望和依托的有力支撑。

采取积极措施支持小乡镇的发展，使县域经济最具活力。一是依靠全县人民力量顽强拼搏、艰苦奋斗、持之以恒，建设新农村发展小城镇。二是采取更加积极手段招商引资，引导有实力公司参与，发挥乡镇企业、民营经济和各类专业农业合作组织参与。三是国家和地方对发展小城镇战略在资金、政策方面应给予积极支持和适当倾斜，同时国家对农林牧副渔生产、加工项目、农村基础设施、农田水利设施、农村公路建设以及适合农村生产加工密集型工业项目，给予必要安排。

关于农民进城问题，重庆曾进行了一次摸底调查，结果是小城镇是农民进城、进乡镇、进工厂打工谋生的首选，在推进城镇化过程中，小城镇具有极大的优越性和吸引力，也是县域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

（作者：农业部外经办原主任）

努力提高城镇化的水平与质量

朱丕荣

一、世界城市化的趋势

城市化是全球经济社会进展的必然趋势和必由之路。据联合国资料，1950年世界城市人口 7.3 亿人，2009 年接近 35 亿人，40 年后将达 64 亿人，预测 2025 年全球将有 29 座大城市人口超过 1000 万人，其中大多数在发展中国家。

世界城市化率（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1900 年 13.6%，1959 年 28.4%，1994 年 45%，2000 年为 50%，预测 2025 年将达 65%，其中发达国家 1970 年 67.5%，1995 年 74.7%，预测 2025 年将达 84%；发展中国家 1970 年 25.1

%，1995年37.0%，预测2025年将达57%。从地区看，欧洲、北美和大洋洲以及拉美地区城市人口超过农村人口，非洲和亚洲仍以农村人口居多。从全球看，城市化达30%~75%期间处于高速发展阶段，到75%以后，则速度将减慢。

拉美地区国家属世界上城市化过快的区域，城市建设和公共服务跟不上城市人口增长需要，社会问题很多，其教训值得吸取。1950年拉美内地总人口1.1亿多人，其中农村人口6430万人，而今拉美内地总人口已逾5亿，其中农村人口6300多万人。60年间，农村人口基本没有增长，而城市人口暴增，城市人口已达4.4亿多人，增加3.8亿多人。2010年拉美已成为世界上仅次于北美的城市化最高的地区之一（城市化率：拉美79.6%，北美80.7%，欧洲72.6%，大洋洲70.2%，亚洲39.8%，非洲37.9%）。带来的问题是：城市硬软件建设满足不了城市人口快速增长需要，社会问题很多。如①住房紧张，出现贫民窟。②就业困难，农民工大量出现，就业与失业难以区别，农民亦工亦农。③社会保障制度缺乏，很难满足人口增长需要，大部分劳动力人口排挤在社会保险制度之外。④贫困现象十分严重。上世纪80~90年代，一直在40%以上，最高达48.3%，目前仍有1/3人口生活水平在贫困线以下（收入低、工作岗位不固定，工作条件差，社会地位低下，无条件社会保险），成为社会弱势群体。⑤分配不公，两极分化。⑥社会治安不好。如墨西哥一个地区贫民窟连成片，居住人达200万人，是暴力殴斗、吸毒、贩毒等发源地。

世界银行把国家人均国民收入分为四个等级，人均GDP1000美元以下，属低收入水平，1000美元~4200美元属中下等收入水平，4200美元~12500美元属中上等收入水平，12600美元以上，称为高收入国家。根据日本和亚洲四小龙跨越中等收入阶段的时间，日本（1966~1985年）新加坡（1971~1990年）分别用了19年；韩国（1977~1995年）香港（1971~1989年）用了18年。中国2001年走出了人均1000美元的低收入阶段，2010年人均超过4200美元，成功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城市化率只49.95%，还处于中低等收入国家水平。主要问题是设施建设公共服务跟不上，受城乡二元化体制制约，进城农民落户困难，农民转化为市民的能力薄弱。估计在未来15年内，中国可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城市是经济增长的推动力量，如美国80%以上的就业靠城市解决，财政收入的87%来自城市。世界城市面积占全球土地的3%多，创造了70%的总产值，集中了超过一半的人口和80%的基础设施，是国家地区和世界的核心区域。

二、中国城镇化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初期，城镇化率仅10.6%，1961年19.1%，1977年17.6%，1978年以后逐步提高，1995年后进入快速增长时期，2010年达49.95%，目前设市的城市达657个。

其特点是①“北高南低”（北部城镇化高，南部城镇化低）向“东高西低”

转变，现阶段是“东高西低”的格局，2006年我国东中西部城镇人口比例计算，东部为55%，中部为40.4%，西部为35.7%，2007年中国城镇化率大于50%的省、市、自治区（除内蒙古外）都分布在东部或东北，除福建和海南两省外的东部和东北地区的城镇化率都超过50%，福建为48.7%，海南47.2%。

②城镇化率30%~50%的地区，提升得快，如河北、河南、陕西、江西、安徽、湖南、重庆等；城市化率高于50%以上的地区，如北京、上海、天津（均超过75%）和东北三省以及城镇化率低于30%的地区则提升的慢。③特大城市快速增加（水平提升和规模扩大），中等城市以上的数量和比重在增加。2008年人口超过100万人的地级以上城市已超过122个。④大都市圈快速增长。如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以及京津冀大都市圈明显成长。2006年这三大都市圈的土地面积占3.38%，人口占15.54%，非农业人口占21.4%，GDP产值占全国36.76%，人均GDP达41576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2.37倍。此外还形成了十余个地方性的大都市圈，如辽中南、中原、武汉、长株潭、成渝、闽东南、山东半岛、北部湾等城镇群，这些大都市圈约占全国土地的12%，承载了全国22%的人口、创造了全国GDP的一半以上产值。

2006年统计，我国城市面积由1985年9386平方公里，到2005年达32520平方公里，增长3.46倍。2001年以来，每年城市征用土地面积都在1000平方公里以上。

城镇化是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火车头，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政府管理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标志。对于促进市场开拓、推进新型产业化、培养高层次人才、创新科技、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出路等方面发挥重大作用。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的3/4来自城市，文化事业产业、医疗、科研、高校、机场、港口、车站都集中在大中城市。按我国国家规划，城镇化率每年可能增加0.8到1个百分点，到2030年达65%。这意味着城镇平均每年要增加2000万人的速度进展。从2010年到2030年基本解决4亿农民工及其家属的进城和落户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发展，我国农民阶级中有了农业劳动者，农民工、乡镇企业工人、农村干部、私营企业主、个体劳动者等不同阶层。全国农业就业比重从1978年的70.5%到2007年的40.8%；而非农产业就业比重从1978年29.5%增加到2007年的59.2%。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但没能真正融入城市产业工人阶层，出现了“农民工”这个特殊群体。目前全国城镇人口6亿多人中，包括有1.5亿多农民工（包括家属达2.32亿人），他们并未享受市民的权利。农民工中在第二产业从业人员中占58%，在第三产业从业人员中占52%，在加工制造业从业人员中占68%，在建筑业从业人员中占80%。实际上，农民工已成为我国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

目前城镇化发展中存在两种偏向。①从建筑角度看，有“赶超型城市化”，大跃进现象，追求形式，高楼化、别墅化、楼堂馆所，大量占用土地，讲究阔气、漂亮、豪华，造成浪费；缺乏城市内涵，公共设施和服务管理水平低下。②从人口角度看，“浅度城市化”，很大部分农民工、暂住人口（户口不在城镇，

在城居住时间一般不超过半年的外来流动人口)不计算为城市人口。2008年12月止,全国有13个省、市、自治区取消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划分,统算居民户口。但是现在城镇化率计算,是用城镇户籍人口加城镇暂住人口除以总人口。第6次人口普查,城镇化率为49.96%。不是真正的城镇化率,有2.32亿流动人口(“候鸟”两栖人、亦城亦乡)未享受市民待遇(占约17%),实际城镇化率仅33%。因此,改变农民工的不利地位,保障这个弱势群体的社会和经济权利,是一项迫切需要解决的任务。据专家推算,农民工市民化的平均成本约在10万元左右。只有实施农民工市民化,才会有中国的城镇化。

如何提高我国城镇化?要从我国实际出发,吸取国际有益经验的基础上,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城镇与农村协调发展,各个城镇之间形成合理分工,互助合作的城镇群。现阶段需要严格控制大城市的发展,适度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镇。要完善区域性中心城市功能,发挥大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引导城镇密集区有序发展,防止盲目扩大规模。要大力推进我国中西部地区的工业化与信息化发展。认真做好城乡发展规划设计(包括土地利用,“米袋子”、“菜篮子”工程、投资、就业、基本公共服务、社会保障、户籍制度等在城乡一体化进程),努力缩小地区与城乡差别。根据不同区位优势与资源特点,优化城镇产业结构,增强城市基础设施、社会文化设施、防灾减灾、社会保障等建设;积极提高城镇低收入居民收入水平和城市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水平;切实解决环境、交通、住宅等问题,建立低耗、低碳、高效、集约、宜居的绿色,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化新型城镇。

(作者:农业部外事司原司长)

世界粮食丰收后的政策动向

吴天锡

编者按:

吴天锡同志多年在联合国粮农组织(FAO)粮食理事会任职,最近根据手头和网上查到的一些资料整理了一篇有关世界粮食方面的文章,以翔实的数据分析了全球粮食的形势和存在的问题以及发展走向,对研究我国粮食问题很有参考价值。

2011年的世界粮食(Food)收成不错。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最近预测,谷物总产可达23.25亿吨,比上年增产3.7%;薯类鲜重2.5亿吨,增产5.2%;油

籽总产 4.72 亿吨，增产 0.4%；糖类 1.73 亿吨，增产 4.1%；肉类总产 2.95 亿吨，增产 1.3%；奶类总产 7.27 亿吨，增产 2.0%；水产总计 1.517 亿吨，增产 3.2%。美国农业部最近发布的世界粮食收成情况，也有类似的趋向（详见 2012 年 1 月 17 日《参考消息》）。总的趋向表明，2011 年的各类粮食生产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加。这对正在从衰退走向恢复和增长的世界经济，无疑是个积极的因素。

但当前世界经济形势总体上仍然十分严峻复杂，国际金融危机仍在影响相关行业，石油价格的攀升，促使依靠石油供应的“现代化农业”的产品成本骤增，再加上某些人为的操纵，各项粮食的市场价格，仍长期居高不下。据粮农组织的监测统计，以 2002~2004 年平均价格为基数，到 2011 年 10 月，各类粮食的价格指数：食糖 357%、谷物 252%、木薯 265%、油籽 218%、油脂 258%、奶类 227%、肉类 175%、水产 152%。虽然均低于危机时的最高水平，但仍处在历史上的高价位上。这扭曲了市场能力，对市场的稳定供应，尤其是对大量低收入人群的起码需要，都是不利的。

粮价长期徘徊于高价位上，也深刻地反映了市场上对粮食生产供应日益不足的担忧。近百年来，在人类社会经济取得巨大进展的同时，也出现了人口的急骤增加，据联合国统计，1950 年时世界人口将近 25 亿人，但短短 60 年的发展，迄今已达 70 亿人之多。人口增长和人民要求改善生活的双重压力，一直紧绷着世界粮食市场上的供应压力，地区性的缺粮历史一直不绝于缕；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进而演变成“全球性的粮食危机”，唤起了国际社会的注意，动员各国采取了多种积极措施，一时保障了粮食的生产供应和绝大多数人民生活的需要。据粮农组织统计，1985 年时世界上主要粮食—谷物生产达 18.4 亿吨，按当时全球人口平均为 380.8 公斤。但此后粮食生产长期滞长，粮食的增长率明显低于人口的发展，到本世纪初期全球人均谷物产量降到 309.7 公斤。又据美国农业部最近资料：“目前世界粮食库存 4.69 亿吨，可供全球消费 75 天。1984~2001 年世界粮食库存一直维持 100 天的合适水平，然而从 2002 年起世界粮食库存仅供消费 72 天，濒临安全底线。再加上社会上两极分化的日趋严重，相当一部分人民（低时 8 亿，高时 12 亿）濒于饥饿和营养不良。这不能不引起我们应有的警惕。

一、粮食安全仍是众所关注的问题

四十年前，粮食问题从地区性、偶发性问题，发展到全球性、周期性问题上，世界粮食安全问题日益提到国际议事日程上来。多年的实践表明，世界粮食安全问题时紧、时松，始终在人类社会经济发展过程和亿万人民日常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实践也表明，粮食安全问题不仅是个综合性的经济问题，而且

也关系到人类社会和政治发展方面。世界粮食安全的基础，在于各国粮食安全的共性及其各自不同的特点方面。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人们采用国家分类剖析的方法来研究这个问题，我当时根据粮农组织大量的可比资料，对当时各国粮食安全情况进行分类研究（研究结果发表在 1982 年 11 期新华社《瞭望》杂志上）。现再根据粮农组织近期的基础资料进行排比，把各国粮食安全情况分为以下五类：

一类国家，农业资源比较丰富，现代农业发展水平较高，国内粮食生产富余，可供大量出口。1982 年时，这类国家包括美国、欧共体六国、加拿大、澳大利亚、阿根廷和泰国等粮食出口国。其国内粮食安全一般比较有保障，他们比较关心粮食贸易问题。新世纪以来，俄罗斯、乌克兰等国也恢复大量出口粮食；美国在粮食贸易上的优势地位，逐渐有所削弱。

二类国家，人口众多，农业资源开发已近饱和，粮食生产一般可以自给，丰年有少量结余，欠年则需少量进口调剂，其国内粮食安全政策偏重于发展生产、公正分配和合理消费。这类国家原有中国、印度、土耳其、埃塞俄比亚、尼日利亚、巴西和其他一些国家。近年来，一些发展中国家因经济发达，有能力进口粮食，不再追求基本自给（如尼日利亚）；有的则因受灾严重，不能自给（如肯尼亚）。总体上看，这类国家有所减少。

三类国家，农业资源相对不足，国内粮食生产不能自给，但其工商业经济比较发达，有的还有石油、矿产等出口物资，有能力进口其所需粮食。这类国家原有日本、韩国、沙特、伊朗等国，近年来，尼日利亚、委内瑞拉等国加入，有不断扩大之势。这类国家粮食生产安全政策，偏重在进口贸易和合理分配等方面。

四类国家，主要是亚、非、拉美等国家，它们长期受殖民经济影响，以生产经济作物为主（如马来西亚的橡胶、埃及的棉花），依靠出口这些农产品换购回粮食，以弥补国内生产的不足。这类国家重视农产品贸易问题，有的已开始调整结构，努力提高粮食自给能力。

五类国家，或是欠缺农业资源；或是连年受灾、动乱，粮食歉收，依赖外援救济。主要是最不发达的 30~40 个国家（如索马里、孟加拉、朝鲜等）。近年由于经济危机和中东动乱，困难国有所增加，再加上城市化发展过程中，流入城市附近的失业人口，数以亿计，困难人口有所增加。

附表：各国粮食安全实况分类表

分类	主要国家	1985 年		2011 年	
		人口（亿）	占世界人口%	人口（亿）	占%
一类	美、欧、加、阿根廷、泰国、俄、	6	12.5	10	14

	乌				
二类	中、印、土、印尼、巴西、南非等	24	50	28	40
三类	日、韩、沙特、伊朗、尼日利亚、委内瑞拉	6	12.5	9	13
四类	埃及、马来西亚、墨西哥等	7	14.5	11	16
五类	索马里、孟加拉、朝鲜等	5	10.5	12	17
合 计		48		70	

从上表可以看出两个趋向性问题：一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近二、三十年来世界粮食贸易有了相应的发展，但国际贸易中问题很多，亟须协商解决；二是由于当前经济危机尚待缓解，带来大量失业人口，再加上粮价高位不下，贫困人口增加，一些地方受灾严重，有的还历经战乱，缺粮人口增加。据粮农组织最近资料，全球约有 10 亿人处于饥饿和营养不良状况，其中仅非洲、亚洲的一些灾区、战区就有 5.78 亿人处于挨饿状况，世界粮食安全问题再度引起人类关注。

二、农业改革之风不断兴起

“全球性粮食危机”过去以后，人们在总结教训中认识到：“现代化农业”的生产模式，过于单纯；过于依赖石油能源……；“现代化”程度愈高，也愈益依赖石油能源。从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到后期，有关国际组织先后召开多种形式的“农业能源会议”、“农业持续发展研讨会议”等。讨论的中心议题转化为“农业模式的改革”；讨论内容也日益深入和广泛，除农业能源问题外，还涉及土地制度、市场机制、农业结构等多方面。一些地方的农民也自发的兴起了“有机农业”制。一时农业改革之风开始兴起。

1979 年中期，联合国下属各有关组织联合召开了《世界农村改革发展大会》，经历一个多月高层人士讨论，达成了“发展要在改革基础上进行”、“在改革中求发展”等共识，确定了改革的三个原则：“人民当家做主、权力下放（主要是指农产品的加工、销售、收益应归还给农民）、公平分配”。此后农村改革主要是在市场机制方面，资本主义国家大力推行了社会化服务项目；一些国家把“计划经济”转为“市场经济”。

2007 年的“石油危机”再次触发了“世界粮食危机”。一时间，批判“依靠石油能源”的现代化农业；批判农业公司侵占农民利益……的舆论蜂起。我当时加以初步归纳，有以下五点：（1）现代化农业机制的内在缺陷，促使农业和加工、销售脱节，大量农业的增利流向非农部门，不仅促使城乡差别的扩大；

而且还在农村中加剧了两极分化现象，大量就业不足的农民被逼流入城市；（2）在日常的生产经营中，追求当前利润，掠夺式开发资源，结果造成农地肥力日益退化；林业资源被滥伐；海洋和内陆水面生物资源过度开发，总的不利于农业的持续发展；（3）以“专业化”为中心的生产经营方式，不能充分发挥当地农业资源的综合潜力，大面积的玉米带、棉花带等，带来粗放经营，破坏了传统的轮作制，并且使生物的多样性大为减少，这些都不利于农业的持续发展；（4）现代化农业的成本大，是当前粮价居高不下的主因；（5）忽视农村公共利益，只重消费而不是积累，农村债务横行，并且相应滋生了一系列农村社会问题。

国际社会因之前再次引起震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组织了 400 多位农业专家，对当前的“现代化农业”进行了综合研究，于 2008 年 4 月提出报告，呼吁改革农业生产模式，强调生产率的提高应与保护资源保持平衡……报告对农业贸易、科技、政策、法规等方面也提出了建议。联合国粮农组织对现代化农业的发展作出评估，在《世界粮食和农业领域土地及水资源状况》的报告中指出。地球上四分之一的土地高度退化；另有 8% 中度退化；36% 的土地情况稳定或轻度退化。报告还指出，水资源生态系统也在日益退化，缺水现象越来越严重。报告呼吁把粗放经营的现代化农业扭向集约化经营的现代化农业。2010 年 11 月在韩国召开的 20 国首脑会议，曾要求联合国各有关专业机构、世界银行、货币基金组织和世贸组织等机构联合研究，就农产品价格居高不下问题提出意见，意见包括“改进农业生产、贸易、援助、储备”等十个方面，强调“改革农业机制，在不摧毁现有市场行为的基础上，保护易受损害人群”。至于国外书刊、网络上发表的个人意见，还有不少，其中相当一部分人的意见倾向于农业结构上的改革。

综合以上各方意见，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针对近期问题的分析和对策，偏重于治标，主要是改进贸易方面的问题；另一类是比较深入、长远的对策，重于治本，主要是改革现有生产经营模式问题。

三、进一步推进“发展贸易、增加储备、加强援助”的应急政策措施

联合国各有关组织为“20 国首脑会议”提供的十条建议，除“增强农业生产能力，持续发展粮农生产”的第一条以外，其余九条，综合了各有关组织提出的专项建议，和一些知名专家的意见，可以概括为以下八条应急措施：

1、在现有机制基础上，建立一个比较完善的农业市场信息制度。要求各有关国际组织、各国粮农主管部门，加强合作，经常提供有关粮食生产、消费、市场供需和储备等方面的统计资料，及时进行监测评估和汇总、分发工作；并配合建立一个快速应对的论坛，协调各方情报和意见，及时、准确地通报给各国粮食安全执行机构和广大的农民群众，以协调共同的应对政策。

2、坚持国际粮农贸易政策上“区别对待”的原则，要求从资金、政策等各方面扶助发展中国家改善其贸易能力，增强其市场准入力量，并保持其适当的“自保”手段；要求发达国家持续减轻其贸易支持程度，逐步清除一切出口补贴；鼓励各国在互利、互助的基础上，推动粮农贸易的发展，保障粮农市场上的正常供需。

3、推进目前正在进行的“多哈”贸易谈判，引导谈判各方从照顾全局利益出发，促使讨论向共同目标发展；清除不合理的贸易障碍，调整各自的切身利益；加强国际制裁活动，防止扭曲生产刺激、贸易套利等不利于贸易公正发展的举措，使所有参与国都能从贸易发展中获益。

4、逐步完善并健全国际粮农市场经济制度。改善共同的贸易和市场准则，切实保障粮农市场的公正、自由贸易，在市场扭曲的情况下，进行适当的干预。通过国际磋商，确定“严重缺粮”的定义，以公平对待出口限制措施；“出口禁令”只能作为保障国内基本供应的、临时性的最后一招。

5、严密监测各级粮食市场价格的变化。合理的价格政策，要照顾到粮食流通和生产成本的实际消耗，提倡从降低成本方面获取应得效益的政策措施；制定共同的规划，严格打击一切囤积居奇、操纵市价等非法牟利行为。

6、鼓励所有有条件的国家增加粮食储备。严格实施必要动用储备的规定。国际社会应通过适当场合协调各国粮食储备政策，逐步加强国际协调储备的能力，以期将来共同建立一个规模不大，但具备战略意义的国际粮食储备体系。

7、加强粮食援助工作。鼓励一切有能力援助的国家增加粮食援助和捐助，援助那些饱受粮价危机的低收入国家和易受损害的人群。提倡粮援，采取“以工代赈”形式，扶持缺粮农民增加粮食产量，逐步改善生活。

8、提倡合理消费粮食，主张在基本满足人畜用粮之前，不将粮食作为工业原料（如美国把玉米加工为油料以弥补石油供给的不足）。要求 20 国政府带头，“当全球粮食市场面临供应压力时不再支持生物能源的生产和消费”。

四、根本之计在于持续发展粮食生产

严峻的形势还在于全球现有农业资源的开发已近饱和，有的人口集中地区、有的部门（如某些地区的海洋渔业资源）已开发过度，而世界人口仍在持续增长，人民生活也还待改善。据粮农组织估计，到 2050 年全球人口将增到 90 亿，为满足那时人民的基本生活需求，各国必须将目前的谷物产量至少再增产 10 亿吨，还要同时增加 2 亿吨的畜产品。也就是说，今后的粮食增长速度必须高于人口的增长幅度。这就需要世界各国今后要加大农业的投资，积极发展科研、教育，把粗放的现代农业耕作制度，改进成为能持续增长的、集约化经营的农业模式。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此，在其综合报告中，强调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应与保护资源保持平衡；主张从农业生产体制到科研、教育、推广指导产品销售方

面，都要进行结构性的改革。其基本内容和二、三十年前泛起的“改革农业模式”意见大体相同。同时，粮农组织也建议各国，在保护现有耕地的同时，扩大投资，逐步开发干旱、半干旱农业地区和草原，提高农业生产率，扩展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最近，又提倡推行保护性农业（农林间作、作物-家畜综合生产系统、灌溉-水产综合生产系统），即现代化的集约经营模式，这种模式已在一些三角洲、丘陵地区建有典型。有的已扩展到农产品的加工和销售方面。

这种能持续增长的、集约化经营的农业新模式，可能是现阶段科学技术水平中比较理想的模式，但根据初步实践，要有几个先行条件：第一、要摸透当地农业资源的综合潜力，找出其相互促进的关键，然后制定规划，量力而行；第二、要有先进的技术指导和雄厚的科学队伍支撑；第三、要有足够的资金进和政策上的扶持；第四、综合经营要有足够的劳力来执行，这可不是一家一户单干能办到的。总之，它牵动到农村社会的方方面面的配合和协作，是对旧制度的一种彻底的改革。

实现这种结构性改革，是广大人民、特别是农民的深切愿望，也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似已势在必行。但是要改革重新分配利益，就必然会触动既得利益者的利益，例如农业公司的利益、特别是几乎垄断了国际贸易的跨国农业公司的利益，他们必然会闻风而抗。最近，联合国各组织为 20 国政府所提的十条农业建议中，虽然仍把“增强农业生产力，以持续发展农业”写在头条，除强调加强科技能力外，没有其他实质内容，却强调“在不摧毁现有市场行为”的前提下推行十条建议，其用意已十分清楚。看来，改革农业模式将不会顺利推行，各国将以此为准则，按照其现实条件，稳步推进，历史前途如何？将拭目以待。

（作者：农业部教授级高级农经师）

日本经济发展成与败的经验教训初探

孙万鹏

昨天下午，温家宝总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日本 95 代首相野田佳彦访华。

温家宝首先表示，过几天就是 2012 年，我们即将迎来中日邦交正常化 40 周年。温总理相信这种交流是坦诚深入的，将起到增信释疑、凝聚共识的作用，向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传递中日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共同致力于和平、友好、合作、发展的积极信息，推动两国战略互惠关系取得新的进展（中国新闻网：2011 年 12 月 25 日 17:36）。

“疑今者察之古，不知来者视之往”（《管子》）。历史是用事例教育后人的哲学。笔者以为，回顾一下，日本经济发展成败的经验与教训，可能会成为“智慧之本，科学之母”。

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创造的奇迹

大家知道，“战争是破坏的科学”（[美]阿波持语）。二战后，日本几乎是一片废墟，满目疮痍。8年全面战争动员以及之前更长时期的局部动员，严重破坏了日本民间经济。数月的密集轰炸毁坏了大约四分之一的住房，以及更高比例的工业建筑和厂房。可以想见，“承受痛苦，比死亡更需要勇气”（[法]拿破仑《语丝》）。日本投降整整3年之后，其经济出口只相当于战前（1932~1936年）水平的1/3¹⁷。“有形损失估计大约是1948~1949年财政年度国民收入的2倍。在接下来的几年中，贫穷与通货膨胀困扰着日本经济，成年日本人平均每天仅摄入1050千卡路里的热量，大约是健康身体所需热量的1/3”¹⁸。“好战是祸，害人害己”。

在美国军事占领的最初两年，日本先前存在的机构和社会经济团体被大规模改造，处在“创业难，守业更难”的处境。然而，在1947~1948年间，面对国内国际的一系列变化，美国对日政策发生“大逆转”，美国的行动不再以根除战前秩序为目标，而是转向建立一个亲西方的、保守的、亲资本主义的新秩序以服务于美国冷战时期的国家利益，并把日本变成其在亚洲最重要的战略盟友¹⁹。美国国务院与美国驻日本大使赖肖尔（Edwin O. Reischauer）就日本的未来向白宫提交了一份秘密政策文件。用心良苦地敦促美国高层支持日本的经济目标，并建议“行政部门坚定地拒绝美国企业界要求削减从日本进口的要求”²⁰。因为，“反对共产主义已成为美国坚持向日本开放市场以促进日本出口增长的理由”²¹。可谓“政治是经济的女儿，所以他照顾自己的女儿是很自然的”²²。

于是，日本在美国第七舰队的保护下，吉田茂政府采用了“新重商主义”、“贸易立国”和政府主导下的市场经济体制，通过保护和培育国内行业的赶超政策来促进民族国家的宏观经济利益。其由三条主线交织而成：一是在诸如农业、基本物资及试图获得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几乎完全对外国有竞争力的进口封闭，在60年代，还对400个产品门类保留进口限制；二是推行既是高度国际化，又是高度日本特色的精益生产为核心的企业管理模式，提升了公司和产品的国际竞争力，金融监管的特征为“主银行体制”下的“护航舰队”式管理模式，为赶超积累资金、降低成本、提高效率；三是严格限制国内政府开支，除鼓励家庭储蓄和限制个人消费者的购买力外，政府将税收负担维持极低层面，奉行严格的财政政策，并将社会福利和国防开支保持在较低水平，全国

¹⁷ [美]彭佩尔（T. J. Pempel）著，徐正源等译：《体制转型——日本政治经济学的比较动态研究》，第122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¹⁸ 同上

¹⁹ 同上，第123页

²⁰ Walter Lafeber, “Decline of Relations during the Vietnam War,” in Akira Iriye and Warren I. Cohen, eds., *The U.S. and Japan in the postwar world* (Lexington, University of Kentucky press, 1989), P. 97.

²¹ [美]T. J. 彭佩尔：2011

²² [苏]高尔基《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

公务员队伍的规模也很小²³，“轻徭薄赋，以宽民力”。

日本在自然资源极度匮乏的情况下，经过短短二三十年，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于1968年登上了西方世界第二经济强国的宝座。1972年生产船舶占全球的50%；该年汽车年产量达400万辆，近一半用于出口；70年代末控制了全球16K可读写存储器芯片40%的市场份额，相同的情景也出现在35毫米相机、家用电子设备、手表、计算器、小型卡车、机械工具以及其他几十种产品的制造领域²⁴。可谓“日本制造”全球开花，重工业有本田、三菱，轻工业有富士、理光等，就是行将没落的三洋，当年也曾在世界上叱咤一时。“日本制造”以其卓越的品质、完善的售后服务，成了名牌的代名词²⁵。

二、20世纪90年代后日本经济走向衰退

20世纪90年代，“日本政府产业政策模式导致了许多产业的根本失败”（郑风田等，2011）。日本股票和土地价格大面积崩溃。紧接着的5年里，日本经济遭遇了“滑铁卢”，最后两年中，经济增速低于1%；股市比1989年12月31日的历史峰值下降了58%；大量公司破产，其中包括许多被认为是“大而不倒”的巨型企业：山一证券公司、北海道拓殖银行、日本第一生命保险公司等，1995年似“屋漏更遭连夜雨，行船又撞打头风”，破产总产几近1994年的2倍；公共部门债务近乎国民生产总值，比其他任何工业化国家都高，加上私营部门的债务，总额超过国民生产总值两倍以上；有线接入“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成为工业化国家中最低；个人电脑人均使用量仅为美国的1/3，且落后于韩国与新加坡；人均互联网“受光于户，照室中”，流量低于几乎所有的经合组织成员国及以色列、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企业在移动通信业上“进退维谷”远远落后于欧美同行——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国际竞争力国家排行榜”，1990年日本排在第1位，到1997年跌至第14位²⁶。

更有甚者，曾经作为质量保证与身份象征的“日本制造”也“火炎昆冈”，屡屡出现恶性事件。1996~1998年三洋公司销售的太阳能发电设备伪劣问题暴露；本田汽车因“机件过热引起音响器材着火”，导致55万辆客车被迫召回；2000年5月，日本东芝笔记本电脑“软驱控制器”的缺陷问题被曝光，两名美国用户“冰炭在怀”，向德克萨斯联邦地方法院提出了集体起诉，东芝公司不得不支付10.5亿美元的巨额赔偿金。

1990年12月至2000年7月生产的三菱汽车问题暴露，“若鱼游釜中”；2001年10月三洋电机售假丑闻发生，“日本制造”在消费者心中，成了“没落”的巨人。

²³ Otake Hideo, “Hatoyama-Kishi Jidai ni okeru chiisaiseifu Ron”（《论鸠山一郎时期的‘小政府’》）in Nihon seiji Gakkai, ed, Sengo kokka no Keisei to Keizai hatten: Senryo igo（《战后国家结构与经济发展：从占领时期开始》）（Tokyo, Iwanami Shoten, 1992），P.165-185

²⁴ [美]T. J. 彭佩尔：2011

²⁵ 郑风田等：《“走出去”面临的挑战》，第85页，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1

²⁶ [美]T. J. 彭佩尔：2011

2001年4月1日至2002年3月31日，日本七大电子企业财年决算，除索尼盈利153亿日元外；NEC亏损3120亿日元；东芝赤字2540亿元；三菱亏损779亿日元²⁷。

2009年4月18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指出，日本经济已经处于战后最糟糕的时期，也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第三次衰退²⁸。

日本的经济为什么会大兴大衰？原因要十分复杂。

哈佛大学著名战略学教授波特认为，日本公司一直以无战略著称，而无战略的成功只能是短期的成功，长久持续的成功需要独特的战略定位（M. Porter, 1996）。认为，二战后日本靠发展制造业起家。开始是模仿欧美技术，曾被嗤笑为“学样的猴子”。后来日本提出了“不再模仿”、“用自己的脚站起来”等创新口号，总结了以精益生产为核心的企业管理模式，零库存的理念，浪费最小化等公司动作层的改善²⁹它使日本产品声名大振，并成就了日本。但是，战略和动作层效率之间的互补性是一个成功公司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正是在许多战略层面上，日本“疑谋勿成”，反应迟钝，才最终导致大面积亏损与恶性事件不断。其一是产业转移时机延误，沉迷于传统产业时间太长，未能远谋。日本瑞银华宝的一位高级分析师指出：传统电器的油水已被榨干，利润空间越来越小，没能及时进行战略转移。如日立在中国生产的普通彩电几乎已无利可图，早在90年代初就很难抗衡中国与韩国的企业，但迟迟不愿放弃，耽误了战机，犯了一个原则性的战略错误。其二是许多日本企业的制度已不能适应时代变化，缺乏二次创新。如一些企业集团决策程序实行的禀议制度，一项提案，往往上下反复，层层汇报、审批，最后由取締役会讨论决定，至少要几个月时间，“猛虎之犹豫，不若蜂蚕之致螫”；在信息化的今天，已明显落伍。其三是日本微观制度出了大纰缪。如国内主要原材料流通渠道由少数几家商社把持，即使要用韩国的钢板及台湾地区的适用树脂，也无法实现自由调拨。税金、电费、水费、房租及物流费，没有一样不高得令人难以忍受³⁰。

全球经营管理大师、国际著名企业顾问大前研一，是个地道的日本人。他指出：“大部分日本企业的模式都是一名职员兼任多种工作，分工十分滞后”，“日本人精明过度导致业务无法标准化”，“虽然职员能够灵活处理各种工作，但是，最终陷入了一种困境：无法向他人说明自己具体的工作内容”，结果导致数据库的建立与外包停滞不前，“跨境业务转移”难以进展³¹。大前研一认为，“对于日本企业来说，削减成本的第一个步骤就是间接业务的标准化。它是日本企业最大的问题”³²，即“标准化是日本企业复活的第一步”。

笔者以为，了解上述种种，我们应该可以对日本经济走向衰退的原因，略

²⁷ 郑风田等：《走出去“面临的挑战》，第87页

²⁸ 同上

²⁹ 孙万鹏：《关于中国企业管理模式的思考》，2011

³⁰ 郑风田等：《“走出去”面临的挑战》，第89-93页

³¹ 大前研一著，郑礼琼译：《应对中国——日本经济对策》，第118-120页，青岛出版社，2011

³² 同上，120页

见一斑了。

三、日本经济发展成败对我国的启示

目前，北美、欧盟和日本仍然是世界经济中最为发达的三大经济体。日本是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两国经济关系非常密切。“以镜自照见形容，以人自照见吉凶”³³。

2010年我国的GDP超过日本，但从衡量经济总量的另一重要指标GNP即国民生产总值却未必超过日本，因为，日本的海外公司每年汇回的利润约占GDP的2%；而我国刚相反，在中国投资的大量外资企业，每年都要把中国GDP中的一部分汇出中国³⁴。

据IMF统计，中国人均GDP仅为4283美元，在全球排名第95位，而日本人均GDP为42325美元，全球排名17。事实上，GNP比GDP更能真实反映一国的经济状况和国民的富裕程度。可谓“足国之道，节用裕民，而善臧其余”（《荀子·富国》）。不仅如此，我国经济发展的均衡程度、社会公平程度、城市化率、产业结构、企业的核心技术拥有程度、研究开发等，都与日本有相当大的差距。日本城乡之间几乎没有差距，而我国至少存在3倍之差。从地区差距看，日本最落后的冲绳与最发达的东京人均GDP之差在2倍之内，而我国最发达与最落后地区之差，不少于10倍。在社会福利保障方面，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已实现养老、医疗保险的全覆盖，而我国至今还有很多农村地区还未能得此之乐（同上）。“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老子》，明莫大乎自见。应该说，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相比，日本经济受到了重创，但是在政府不间断的大规模公共事业投资和央行超宽松货币政策的支撑下，2009年6月日本经济已出现“拐点”。2008年度GDP增长率为-4.1%，2009年为-2.4%，2010年（日历年）实现了3.9%的正增长（日本内阁府2011年2月14日公布），不仅是20年来日本最高的增长率，而且也高于同期欧美发达国家。该年，日本的净出口高达8万多亿日元，同比增长50%以上，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46.2%，进口也增长9.8%（同上）；该年1~9月，工矿业生产指数同比均为两位数以上的正增长，10~12月分别为4.3%、8.1%和5.4%，估计该年度工矿业生产将为13.8%的正增长（日本内阁府：《关于平成22年度经济走向》）；2010年制造业开工率，上半年已恢复到90%左右，不仅使企业信心指数得到提振，而且带动了设备投资的扩大，该年第三季度企业设备投资总额为5.56万亿日元，同比增长4.8%；企业效益迅猛回升是该年日本经济一个耀眼亮点，一季度同比上升272.7%，二季度125.9%，三季度同比上升50.7%，这在日本经济史上也属罕见，以丰田为例，虽受召回事件严重影响，2010年上半年丰田汽车产量仍居世界第一，全年赢利预计5400亿日元，此外，日产、马自达、铃木等汽车厂家也是大幅度赢利，足见日本制造业国际竞

³³ [唐]张九龄《进千秋节金镜录表》

³⁴ 王洛林、张季风等：《日本经济与中日经贸关系发展报告（2011）》，第18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争力仍然很强³⁵。

笔者认为，日本经济发展的成败对我国有颇多启示：

我国许多企业也与日本一样，一直以无战略而著称，其实，在今天激烈又渐趋成熟的市场竞争社会里，无战略是一种近视眼，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一旦企业的比较优势丧失了，往往就陷入危机，造成收益递减，企业衰退。应朝着“战略——技术——新战略”的三极发展方向，建立战略优势。当然，战略优势往往是建立在独特的经营活动与定位上，“模仿，蹩脚的模仿，这是国民最为伤心和征兆”³⁶。要认真吸取日本的教训，要以独特的战略代替模仿”³⁷，最后才能获得持久的竞争优势。

日本曾以精益生产为核心的企业管理模式闻名于世。现在，它作为一种理念、模式和力量，已经泛化为全球企业学习的榜样，其创始者是丰田的大野耐一。但是，“召回门”事件发生后，这种精益生产方式受到了质疑。不过，“书从疑处翻成悟，文到穷时始有神”（《治学联》）。笔者同意全国日本经济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王洛林、张季风等人的看法，“丰田之所以出现了这样巨大的质量问题，恰恰是因为丰田在快速发展、扩张的过程中忽略了精益生产方式这一得以成名的根本，放弃了这一具有开创性的组织创新，转而追求快速掠夺全球市场份额”³⁸。当然，作为一种管理思想与理念也需要在不同阶段由新的思想充实，如“微观——宏观——新微观”三极发展的思想。

笔者认为，除了上述以外，日本经济发展的成败对我国最有启迪意义的当属在利用 christensen 技术方面的经验与教训。这对于在短期内尚难以完全摆脱科技落后局面的我国创新，既“撒下了种子，也撒下了希望”。

所谓 christensen 技术，最早由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 Clayton Christensen 提出，为了纪念 christensen 的发现，一些学者将其称为 christensen 的技术，或称“裂变的技术”。正是由于这种技术为后来者提供一种难得的机会去战胜技术领先的公司，可谓是“愿将黄鹤翅，一借飞云空”³⁹，从而获得后发优势。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中期，全球汽车的先进生产技术一直牢牢地被控制在欧美汽车巨头手里，他们追求的大都是体积庞大、豪华、追求速度与气派，日本若模仿欧美就永远难以在技术上战胜对手，于是就从原来领先的高端技术裂变出一个分支，发展出小型化、节能化的车型，不是追求向上的技术改进，而是满足石油危机消费者对汽车的心里预期所进行的市场创新，结果占领了美国市场。日本索尼也是利用 christensen 技术而取得成功的。当时美国晶体管技术一流，厂商靠专利与高价获超额利润，产品体积大，适用于家中或办公室使用，

³⁵ 王洛林、张季风等，2011

³⁶ [日]北村透谷《国民和思想》

³⁷ 郑风田等，2011

³⁸ 王洛林、张季风等，2011

³⁹ [唐]孟郊《孟东野集·上包祭酒》

索尼却开发出满足一般学生在路上收听音乐的方便的小体积产品，音质稍差，价格低，最后成功占领了美国家电市场。东芝利用 christensen 技术，开发出体积紧凑的电脑显示器，从而在笔记本市场上一直居世界领先地位。日本摩托车占领欧美市场也如出一辙。但是，日本的教训是成功地占领国际市场之后，自觉不自觉地走入了另外一个误区：抛弃 christensen 技术，转而追求高额利润。结果使许多普通消费者被拒之门外。而美国人却认真总结教训，根据市场作出调整，最后又成功地抢回日本占领的市场份额⁴⁰。其体现的“不仅是斗术，而且是斗智”。

事实上，科技巨人乔布斯个人电脑的推出，也是利用 christensen 技术的成功事例。之前，电脑一直与普通人的生活几乎没有什么联系，至少每台 10 万美金，仅为军工单位、大学与大科研单位所拥有。乔布斯的个人电脑被看成是不入流的玩具型的产品，但满足了普通消费者的需要，几乎一夜之间，他的苹果机突然长成巨人迅速成为当时美国的第一大电脑生产厂。

值得一提的是，与真空电子管相比，半导体晶体管也是一种 christensen 技术⁴¹。N-P-N，P-N-P 三极放大的思想，就是半导体晶体管这种 christensen 的裂变思想⁴²。要知道，眼前，我们需要“中国的乔布斯”；但是，从历史的眼光看，“技术总是要败给思想的”。

（作者：国内外灰学创始人、浙江省农业厅原厅长、世界灰学文化联合会主席）

农业连续八年大丰收

吴信达

编者按

作者吴信达同志系第一代北大荒人，毕业于东北农学院农机专业。1956—1986 年在北大荒从事农机与农场领导工作，先后任农机技术员、农机科长、853 农场场长、牡丹江农场管理局局长等职，历时 30 年。退休前任中国农业工程规划设计研究院党委书记。2005 年出版了《我在北大荒 30 年》，记述了艰苦奋斗的动人经历，受到读者特别是曾在北大荒劳动锻炼城市知识青年的好评。在下面这篇文章中写的“北国垦荒犁大沟——科学种田夺丰收”，借用了 1963 年肖克老将军写给张林池老部长的诗“车挽大犁开大沟……人定胜天夺丰收”，现一并刊载如下，以飨读者。

新华社报道今年我国农业连续八年大丰收，我国粮食产量创新纪录，粮食总产量达到 11424 亿斤……

2011 年 12 月 12 日中午新闻联播报道黑龙江省今年获得农业大丰收，全省

⁴⁰ 郑风田等：《“走出去”面临的挑战》第 215-216 页

⁴¹ 同上，第 213 页

⁴² 孙万鹏：《从“吹灯号”到三极进化的思考》，载于《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通讯，2011 年第七期

粮食总产量跨越连续 6 年超千亿斤的河南省，居全国首位——是产粮第一大省，总产量为 1114.1 亿斤，占全国总产量的 9.8%。今年黑龙江省粮食总产量和商品量实现全国双第一。黑龙江省农垦总局今年农业生产实现“八连增”，粮食生产再夺历史性大丰收，粮食总产首次突破 400 亿斤，可喜可贺，真是了不起。是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特别是农民兄弟（农垦战友）艰辛劳动的成果，是改革开放的巨大胜利。我到部里农垦局农业处了解这一喜讯后，就给王光希同志通电话，我说：“光希、今年全国农业大丰收，黑龙江省粮食产量创新高，黑龙江省农垦总局今年粮食总产 400 亿斤……”王光希同志是我们 50 年代初在农业部国有农场管理总局工作时的老战友、老同事、好朋友。1956 年春农垦部成立时我们一帮年轻人都加入开发北大荒的行列，当时有王保公、李重祥、王惠玲等。王保公在农业处是农业技术员，王光希、李重祥、王惠玲在水利处是水利技术员，我在机务处是机务技术员，我们先后到北大荒开荒建农场，转眼五十多年过去了，真是弹指一挥间。

北国垦荒犁大沟，
建场、修路、治水、造林、科学种田夺丰收。
风风雨雨 50 春，
莺歌雁（燕）舞 50 秋⁴³。
真棒，“北大荒”，
腾飞，“北大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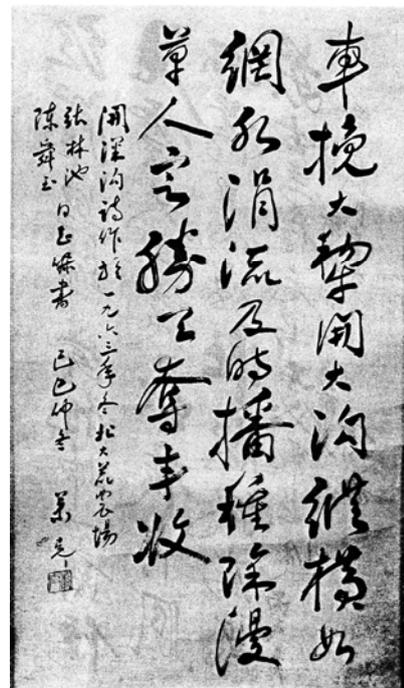
农垦部成立不久，王震部长、张林池副部长（身兼合江地委书记、后兼省委副书记、东北农垦总局局长、党委书记）率领部机关干部长年在北大荒蹲点指导工作，与垦区职工同吃、同住、同劳动艰苦奋斗 50 余年，当年期盼的变“北大荒”为“北大仓”今天实现了。是名副其实的国家商品粮大基地。

我到部里农垦局农业处找到孙克俭同志请他帮我查一下黑龙江省农垦总局今年农业大丰收的情况，他热情地拿给我一个文件看，记述如下：

黑龙江省农场总局今年粮食产量实现“八连增”，粮食总产首次突破 400 亿斤，达到 407.4 亿斤，较上年新增 43.8 亿斤。

垦区粮食总产跨上 100 亿斤台阶用了 48 年，跨上 200 亿斤台阶用了 10 年，跨上 300 亿斤用了 4 年，粮食总产突破 400 亿斤大关，仅用了 3 年。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了巨大贡献。

2011 年水稻、玉米面积 3203 万亩，其中：水稻面积 2182.4 万亩，较上年新增 258.9 万亩；玉米



肖克

(国防部原副部长兼军事学院院长，原农垦部副部长)

⁴³ 莺歌燕舞，特用“雁窝岛”的雁

面积 1026.6 万亩，较上年新增 88.2 万亩。平均单产分别达到 586 公斤、546.6 公斤。大豆平均单产 181.2 公斤，小麦平均单产 381.2 公斤，均创历史新高。

（作者：农业部规划设计研究院原党委书记，曾任黑龙江省 853 农场场长、党委书记，牡丹江农场管理局局长）

附 1：吴信达同志来信

我感到《论坛》是一个很好的学习园地，也是一个很好的交流平台，祝《论坛》越办越好。

今将“北大荒”从《农业连续八年大丰收》中的摘出来的一段又加小的修改，题目为“北大荒”。

北大荒
吴信达
北国垦荒犁大沟
规划建场修路治水造林
科学种田夺丰收
风风雨雨 50 春
莺歌雁舞 50 秋
真棒北大荒
腾飞北大仓

2011 年 12 月 21 日上午到团结湖邮局给好友郭书田同志寄本书，《我的退休生活》，同时将“农业连续八年大丰收”一文邮去，因为北大荒连续八年大丰收，创历史新高，更可庆的是黑龙江农垦粮食总产上了大台阶——407.4 亿斤。我将“大丰收”短文两页纸夹在书的首页，邮递员同志拿出书看到这两页纸就问我这是信吗？

我说：不是信，是篇短文，与这本书有关。

邮递员说：这要分开寄。

我说：咱们都学“北京精神”，不是讲“包容”吗！请你“包容”一下吧！

邮递员说：大爷，这可不好“包容”。

我说：今天就“包容”一次吧。

她又问我：大爷，挂号吗？

我问：挂号多少钱？

她说：4.5 元。我把钱交给她。

她又说：大爷……

这是个践行北京精神的小故事。

附 2 赞农业连续八年大丰收（大公报 2012 年 1 月 6 日 第 38906 号）

讚農業連續八年大豐收

——昔日「北大荒」如今「北大倉」

近日，農業生產又傳捷報。伴隨中國糧食的大豐收，今年我國糧食產量達11424億斤，創下了半個世紀以來首次連續八年增產的佳績。在全國糧食生產表彰大會上，黑龍江省名列榜首。在中國的東北角，昔日的北大荒已經成爲了保障國家糧食安全戰略的「北大倉」。

現今年已八旬的吳信達聽到這個消息後十分激動，他曾任黑龍江省農墾853農場場長、黨委書記、牡丹江農場管理局局長、國家農牧漁業部物資司副司長，也曾任農業部規劃設計研究院黨委書記。而讓他終生難忘的是在北大荒生活工作的三十年。

新中國建立後，國家對「北大荒」進行了有組織的開發。早在1956年，年僅24歲的吳信達從農墾部隨王震部長到北大荒規劃、踏察並與王保公、王光希等年輕人加入開發北大荒的行列。那時，數萬名解放軍復員官兵、知識青年和革命幹部，響應黨和國家的號召，懷着保衛邊疆、建設邊疆的豪情壯志來到「北大荒」。他們爬冰臥雪，排乾沼澤，開墾荒原……回憶起往事，吳信達感慨地說：「記得1956年國務院農墾部成立時，毛主席、周總理對王震部長說，『全國農墾能給國家提供100億斤商品糧就好了。』農墾部成立不久，王震部長、張林池副部長率領機關幹部長年在北大荒蹲點指導工作，與墾區職工同吃、同住、同勞動。如今55年過去了，北大荒墾區經過兩、三代人的奮鬥，在黨的正確領導下、全國人民的支援下，特別是黨的改革開放政策、惠農政策落實、堅持科學發展觀，今天北大荒墾區連續八年大豐收，2011年糧食總產突破400億斤大關——407.4億斤，商品糧可達360億斤以上。」

如今，當年期盼的變「北大荒」爲「北大倉」的夢想終於實現了。這個年已八旬的農墾老兵激動地寫下這首詩：

讚北大荒

北國墾荒犁大溝
規劃建場修路治水造林
科學種田奪豐收
風風雨雨55春
鶯歌雁舞55秋
真樸北大荒
騰飛北大倉

（吳信達寫於2011年12月28日北京）

地 址：

北京市建國門內大街5號 中國社科院社會學研究所
中國社會學學會農村社會學委員會 郵編 100732

联系人：

陳嬰嬰 電子信箱：yychenai@yahoo.com

侯清香 電子信箱：houqingxiang@126.com